

# 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 態度及其意義 ——以臧庸與李兆洛為討論中心

蔡長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關鍵詞：常州學派 漢學 考據 八股文

## 一、概念的建立

學者之論乾、嘉學風，每以考據一詞概括之。然而，略作分析的話，考據一詞之完整概念，至少可以包含漢學與考據這兩個層次在內。筆者以為，乾、嘉學者不論是吳、皖抑或揚州，在學術認同上，當是以廣義的漢代學術為圭臬<sup>1</sup>；在治

<sup>1</sup> 筆者此處所指者，乃不論是求真之皖派，或信古之吳派，或是高郵王氏、揚州阮氏、劉氏，多以漢人經注，或受漢學影響之魏、晉經注，作為進一步討論專門學問，如經學、天文學、地理、音韻等之依據，並產生了相應於認同古注疏，亦即認同漢學之學術態度，故筆者以「廣義的」漢學視之。即以戴震而論，在一般概念中，戴震與惠棟在治學態度上或有信古與求真之粗別，然從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一文觀之，戴震基本上仍是傾向漢學，所以文中顯示出在與惠棟交往之後，其論學已由漢儒、宋儒分說，義理、制數互有得失之見，一轉而以為義理統於訓故，所得盡在漢，而所失盡在宋矣。至於戴震之弟子，或受戴震影響之學者，則更不必論矣。錢穆先生認為乾、嘉詆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其尊漢抑宋之態度，亦有聞於惠氏而起，可謂深識。相關的討論，亦可參陳祖武、李開、張素卿、張維屏之說。〔清〕戴震：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見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第6冊，頁50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322；陳祖武： 關於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 ，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委會主編：《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

學方法與內容上，則除了常為學者所提到的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外，天文、曆算、史地、方志、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與名物、典制、樂律、職官、金石之學等，不但是乾、嘉學術活動中，不可或缺的要角，也是考據學的主要名目。而所謂的漢學考據，當即包含了上述所言的互為表裏的兩種層次在內。筆者相信這一點是不難從乾、嘉學者的著作中找到證據的。這是乾、嘉學術的主要形式，乾、嘉學者藉由對漢學考據的認同而形成其學術價值觀，並不斷擴大此一新的學術範式的影響力。漢學考據不但威脅到官方所認可的宋、明理學長久以來的學術正統地位，也在相當的程度上，改變了大江南北眾多讀書士子的為學途徑<sup>2</sup>。

如上所言，在普遍的印象中，學術界對清代考據學的歸類，主要有吳派、皖派以及揚州學派等。這種學派之劃分，雖有將其地域之特殊性考慮在內的意味，然而以漢學考據為彼此共同之語言，當為學界共識。至於常州，似較少被納入考據學的陣營當中。筆者相信，前輩學者在歸納學術現象時，未將常州列入考據陣營中，必有其充分之理由。或許因講求微言大義的「公羊學」在常州聲勢浩大，也或許如劉師培（1884-1919）等人所認為，常州學者的考據學著作惟記誦淵雅，然尚未達到考據學要求的水平之故。最具影響力的說法，則是將常州學術排除在乾、嘉考據學的潮流之外，將之定位為清代晚期相應於內外交侵的歷史情境中，所新興起的學術派別。此說自梁啟超以下，殆已成為學術界討論晚清今文學興起的原因、背景之共識，甚至已成為學者討論晚清思想時，所預設之前提。然如此說法，與將考據學的興起視為是出於清廷文字獄高壓所致，同樣的單調而生硬，其是否合於歷史事實，也仍有討論之空間<sup>3</sup>。至於首先將常州學者的學術作為納入

---

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年），頁253-256；李開：《戴震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55-163；張素卿：「經之義存乎訓」——惠棟經學管窺，收入林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頁281-318；張素卿：惠棟的春秋學，《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7期（2002年11月），頁102-140；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年），頁19-21。

<sup>2</sup> 按：有關考據學對清代中葉學術與文化之轉化及其意義的詳細討論，請參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sup>3</sup> 按：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於第貳章第二節中，曾對此加以討論。筆者認為，以常州莊氏之學，乃起於道、咸以後，考證衰敗之際的論斷，與梁氏為鋪陳其「清學分裂論」，根據所見所聞，為清代學術編排自認為合理的發展進程之敘述觀點有關。若依梁氏之說，顯然無法解釋乾、嘉之際常州學者對漢學考據的熱情參與這一學術史實。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頁26-39。

考據學潮流中思考的，當推美國學者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先生。在其討論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的大著中，艾氏指出常州學者的學術淵源與科舉之學有密切關聯，並將常州學者的學術活動視為漢學運動的一部分或旁支。他認為常州與蘇、揚之異顯現出漢代經學的複雜性，而且阮元 (1764-1849) 及其同行都將常州今文經學視為漢學運動的一部分<sup>4</sup>。就指出常州的學術淵源以及將常州學術納入考據學的視野而言，艾氏之說實具有開創之功。然而或許他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此，所以他並未充分意識到科舉儒學對常州學者學術價值觀的制約，也未對常州的學術活動與考據學之間的對應關係多加著墨。亦即他似未清楚的認識到：常州學派的興起乃是導因於回應考據學風潮對科舉文章之學的批判，而並非如艾氏自己所言，是莊存與 (1719-1788) 在乾隆晚年因目睹和珅 (1751-1799) 亂政而轉向《公羊》學所致。在筆者看來，學派的形成，主要還是緣於許多學者共同的學術旨趣。常州學派的興起，則是一種文人爭「學術正統」的集體意識之體現，而不是單純的出於個人意志對現實政治的批判而已。同樣的，將常州學者的學術活動單純視為漢學運動的一個旁支，對吾人欲理解乾、嘉之際的常州學術，恐助益不大。因為若依照這樣的角度來觀察，恐將無法看出常州學者與考據學對立的事實及其所蘊涵的意義。也因此，筆者以為惟有釐清常州學者在面對考據學時所顯現的態度，才能掌握常州固有之特殊學風，也更能明白常州學者在面對考據學這一新學術範式所形成的新的學術價值觀之挑戰時，如何以其自身的學術理念回應此一挑戰，以及此一運動本身之學術意義。

所以，本文的用意，並非僅停留在品評常州學者的考據著作成就如何而已，而是要進一步從學術發展的宏觀角度來觀察，在考據學潮流與常州學術的相互激盪之中，考據學所代表的新的學術價值觀是如何取代常州既有的經術文章之路，而常州學者又是如何轉化考據學範式，使之成為常州學者治經的一大特色。在這種新舊學術範式取代與轉換的過程當中，原有的學術價值體系必會遭受到嚴重衝擊，也必定會有人出面來對考據學思潮的強勢入侵，加以批判。觀察考據活動在常州興起的過程，當可體現一代學風之變化，也可以看到常州學者自身在面對學術大環境改變時的因應之道，以及因此而凝聚出具有常州特色的學風。因為在筆者看來，強調微言大義與儒學經世的常州學派，並非如成說所言，是形成於晚清內憂外患的歷史情境之中，而是形成於方興未艾的考據學思潮強烈的挑戰之下，

<sup>4</sup> 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章。

其時代之斷限則最晚應在乾、嘉之際而非在道、咸以後。以下的討論，或有助於進一步說明筆者上述的觀點。

## 二、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態度

在討論臧庸 (1767-1811) 與李兆洛 (1769-1841) 對考據學看法的分歧之前，有必要先大略介紹在兩人之前的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常州學者與考據學潮流的接觸，與常州學者為官都下或游幕四方，頗有關聯。對考據學思潮作出回應的常州學者，似乎是始於乾隆盛世為官北京的莊存與：這是筆者在閱讀如《常州先哲遺書》、《武陽縣志》、《毗陵人物小傳》等清代常州文獻記載的過程中，所觀察到的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此或與莊存與的政治身分及當時在北京的士大夫對漢學考據之狂熱有關。文獻顯示，在莊存與為官北京的乾隆二、三十年代，正是盧文弨 (1717-1795)、王鳴盛 (1722-1797)、戴震 (1724-1777)、紀昀 (1724-1805)、王昶 (1724-1806)、錢大昕 (1728-1804)、朱筠 (1729-1781) 等著名漢學家群集北京的年代。除了盧文弨稍長於存與之外，這些人對莊存與而言，在年紀上甚或是在政治輩分上，都是屬於後輩<sup>5</sup>。然而當時負學術重望者，卻是朱筠、錢大昕、紀昀、王鳴盛、王昶等鑽研名物訓詁、六書九數，以漢學相標榜的年輕新貴。戴震的入都，更催化了考據學的效應，使漢學考據的支持者在北京的聲勢達到最高峰。乾隆十九年 (甲戌，1754)，戴震因避仇而入都<sup>6</sup>，交識錢大昕，又因錢之薦，受聘助秦蕙田 (1702-1764) 編纂《五禮通考》，並受聘於紀昀，任家庭教師，其後又廣交盧文弨、王鳴盛、朱筠、王昶等著名學者，而段玉裁 (1735-1815)、王念孫 (1744-1832) 亦於此一時期拜入戴震門下。四庫開館之後，更替以漢學考據為職志的學者，造就有利環境，影響所及，則是對原先藉由科舉考試，以經術文章進身的文人之業帶來排擠效應<sup>7</sup>。章學誠 (1738-1801) 曾經紀錄過這個現象。他提到乾

<sup>5</sup> 例如錢大昕是乾隆十九年進士，其座主為錢維城，維城乃存與表弟，與存與為乾隆十年同榜進士，維城狀元，存與榜眼。故就政治輩分言，錢大昕實為存與後輩；然就學術聲望言，則存與不逮錢氏。其故在所操持之術不同，錢氏所致力者，為新興的考據之學，存與所堅持者，則舊有的經術文章之路。

<sup>6</sup> 按：有關東原入都年月，有兩說。洪榜、段玉裁均以為在乾隆二十年，而王昶、錢大昕自記則在乾隆十九年，本文從錢、王之說。詳細討論請參：鮑國順：《戴震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頁27-28。

<sup>7</sup> 按：梁啟超先生云：「四庫館就是漢學家的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家的結晶體。康熙中葉以來漢、宋之爭，到開四（庫）館而漢學派全占勝利，朝廷所提倡的學風，

隆初葉時，流傳的是世傳舊法的廊廟制作，簡而言之，即經術文章之學。然而數十年來，山林枯槁之士，淪靈疏性的專門名家之學，薈萃於都下，而後草野之學，始稱極盛，有駸駸乎廟堂制作之勢<sup>8</sup>。這是章學誠於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在北京見到的情況。他說：「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學子藝業，而為名物攷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易俗矣。」<sup>9</sup>與章氏氣類相違，時相詬厲的汪中(1744-1794)，也有類似的說法，如云：「戴君遊京師，當世推為儒宗。後數歲，天子修四庫之書，徵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嚮於學矣。」<sup>10</sup>汪氏此處所言之學，指的正是章學誠提到的「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也。事實上，在清人的著作中，並不乏與章、汪二人看法相同者，如陳澧(1810-1882)即云：「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蓋前此惟重詩文耳，惟篤學者乃重經史，至是則凡為士大夫者皆重之也。」<sup>11</sup>章太炎(1869-1936)先生則云：「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願斂衽為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sup>12</sup>制藝與經義分途，在乾、嘉之際實有不可挽回之趨勢，方面大員如畢沅(1730-1797)，延臧庸課其孫，於往還書札中亦透露此一訊息，如云：「小孫資質遲鈍，得蒙時雨之化，循循善誘，目前所最要者，惟令潛心經義，兼習訓詁，俾之識解漸開，不失為通經之士，並不望其專習舉業，為下閭計也。」<sup>13</sup>又云：「近來崇尚實學，但求循序漸進，不失為通經之士；至制義一道，與經義是一是二，原可通也。」<sup>14</sup>又云：「且近來崇尚實學，果能貫通經義，較之詞章一道，更為上乘矣。」<sup>15</sup>從畢沅與臧庸的書信中，吾人可以感受到詞章與經義對立的緊

被民間自然發展的學風壓倒。」梁氏還提醒研究學術史者當注意朱筠(漢學家)與劉統勳(宋學家)就奏開四庫一事所顯現漢、宋學術消長之消息。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華正書局，1989年)，頁24。

<sup>8</sup> [清]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150。

<sup>9</sup> 章學誠：周書昌別傳，同前註，頁181。

<sup>10</sup> [清]汪中著，王清信、葉純芳點校：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頁262。

<sup>11</sup> [清]陳澧：《東塾雜俎》(北京：中國書店據癸未春刊成古學院藏版影印《敬躋堂叢書》本)，卷11，頁18。

<sup>12</sup> 章太炎：《噓書·初刻本、重刻本》(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160。

<sup>13</sup> [清]臧庸：上畢纘衡制府書附[清]畢沅與臧在東書第二通，《拜經堂文集》(同治九年上元宗氏據漢陽葉氏舊藏本)，卷3，頁56。

<sup>14</sup> 畢沅：與臧在東書第三通，同前註，頁57。

<sup>15</sup> 畢沅：與臧在東書第四通，同前註，頁57。

張關係，天下讀書士子非再以詞章為惟一學習的對象，而是有彼等認為更上乘的經義實學可以取而代之。

所以，吾人似不可輕忽經生與文士在乾隆盛世學術地位交替的這一歷史事實，因為它代表的是兩種不同學術路徑與學術價值觀的交鋒，前者代表一種對官方所認可之學術的疏離，後者則亟欲證明學術之正統，乃是行之久遠的經術文章之路，而其代表人物就是莊存與。

除了廣為人知的維護《偽古文尚書》、對學者嘖嘖爭辯古籍真偽感到不以為然之外<sup>16</sup>，他常批評傳經之先師，乃章句小儒，說他們：「日讀其書，不能知其人。」<sup>17</sup>又說：「誦師之言，僅能弗失者，何足以及此。」<sup>18</sup>又說：「哀哉承學之士，愚而不能違也。」<sup>19</sup>又說：「誰為此傳者，畔經誣聖，豈不甚哉！」<sup>20</sup>觀存與之意，蓋藉此以批評當時專主訓詁說經之士為章句小儒，不足以知聖王天道。所以在著作中，常有對考據之學的批判之言，如云：「自分文析字，繁言碎辭，日以益滋，聖人大訓，若存若亡，道不足而強言，似是之非，習以為常，而不知其倍以過言。」<sup>21</sup>此為批評以訓詁說經者對道的掌握是破碎而求速成的。又例如說：「徵實事，傳故訓者，為膚為末，豈足以知之於是乎！」<sup>22</sup>知之於是者，即知聖人之道也。然聖人之道並非聲音詁訓即可求得，而在經文所蘊涵的微言大義之中。由存與的批判之言不難推知，其學術觀點與其政治身分密不可分。蓋身為皇家教師，惟有洞悉經術，出以深美閎約之文，方能發揮經教，闡聖人之精微，此乃莊氏子弟根源於制藝之教的學術觀，並充分顯現在莊家子弟的言論當中。例如存與之弟莊培因(1723-1759)在《殿試對策》中即云：「竊有慕於賈誼、董仲舒之策，陸贄之奏議，其所敷陳，皆能切于事情，合于理道。而徒自安于佔畢聲華之末，無當乎明體達用之學，此臣所夙夜疚心者也。」<sup>23</sup>又說：「我皇上學貫天人，闡往聖之微言，息群喙之淆惑，雖唐、虞之一中授受，洙泗之集大成，何以

<sup>16</sup> [清]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見夏田藍編：《龔定庵全集類編》（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卷12，頁295。

<sup>17</sup> [清]莊存與：《尚書既見》，收入《味經齋遺書》（光緒八年陽湖莊氏刊本），卷2，頁11。

<sup>18</sup> 同前註，卷2，頁8。

<sup>19</sup> 莊存與：《春秋正辭》，收入《味經齋遺書》，卷2，頁4。

<sup>20</sup> 莊存與：《尚書既見》，卷2，頁15。

<sup>21</sup> 莊存與：《四書說》（光緒八年陽湖莊氏刊本），頁75。

<sup>22</sup> 同前註，頁4。

<sup>23</sup> [清]莊培因：《虛一齋集》（光緒九年刊本），卷5，頁19。

尚茲，而列在『儒林』者，其何以仰副國家表章正學之盛意哉！」<sup>24</sup>言下之意，蓋欲追摹董、賈策論之風，為通儒之學；而謂列在「儒林傳」之經生，其佔畢訓詁，乃聲華之末，不足以言正學。培因所述者，乃莊氏家族的為學進路與學術價值觀，顯然與考據學家所標榜者大異其趣。

所以必須指出的是，雖然莊存與同上述考據學者在年歲和輩分上相當，政治身分也高居其上，然而在那股天下風靡的考據學氣氛當中，主盟學術壇坫的並不是莊存與，而是紀昀、朱筠、錢大昕、王昶等人，其原因在於莊存與的學術見解與上述居於主流地位的諸家有所不同。莊氏的學術見解乃由其成學途徑與後來的政治身分所決定。簡言之，是對儒家經典所蘊涵義理之普世價值的認定，此一認定來自於自幼所薰習的儒家制藝之學，莊存與將之發揮於教導皇室成員的教學講義之中，其形式乃是科舉士子所慣用的經術文章，而非考據學者所使用的名物訓詁之路<sup>25</sup>。從其批判的言論推之，莊存與必定感受到考據學風潮所帶來學術範式與學術價值觀的巨大改變，而這種轉變又是莊存與所不樂意見到卻又無法改變者。戴震入都，代表的意義或即為廟堂所在之地最後亦為考據之學所淹沒，而後所謂大儒者，乃從經制之儒一轉而為考據之儒也。董士錫(1782-1831)所提出的乾隆間經學巨匯別流之說<sup>26</sup>，以及魏源(1794-1856)所提出的真漢學之論<sup>27</sup>，當由此經生與文士學術地位升降的角度觀之，方具意義。雙方之攻防，體現在對新舊學術範式與學術價值觀的取舍之間。

隨著常州學者的游幕四方，考據學對常州學者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其中，最著名者首當推洪亮吉(1746-1809)與孫星衍(1753-1818)。洪亮吉年長孫星衍七歲，二人是同鄉兼好友。在許多文章中，洪亮吉屢次表示對惠棟(1697-1758)、戴震、朱筠等人及考據學的讚許，可謂考據學流行於常州的最佳宣傳手。例如在《書

<sup>24</sup> 同前註。

<sup>25</sup> 按：有關於莊存與的為學途徑與政治身分對其學術見解之影響，請參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第3、4章。

<sup>26</sup> 按：董士錫曾論存與著作，以為「旨遠而義近，舉大而不遺小。能言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流別，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巨匯也。」〔清〕董士錫：《易說序》，收入《味經齋遺書》，卷首，頁3。

<sup>27</sup> 按：魏源稱許存與之學是：「寧乎董膠西之對天人，醇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劉中壘之陳古今，未嘗凌雜釁析，如韓、董、班、徐數子所譏。故世之語漢學者，鮮稱道之。嗚呼，君所為真漢學者，庶其在是，所異于世之漢學者，庶其在是。」〔清〕魏源：《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37-238。

朱學士遺事 一文中，他表彰朱筠提倡聲音訓詁經史實學及促成四庫開館之功<sup>28</sup>；又如任貴州學政時，即上疏請《禮記》棄元儒陳澧《集說》，改用鄭康成《注》<sup>29</sup>；又如在 杭堇浦先生三國志補注序 ？，發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纂者紀昀以及當代史學大師錢大昕的史學理論，批判詞人、塾師論史之隨意褒貶，空發議論，強調應以漢學的求實學風，致力於做基礎、踏實的工作<sup>30</sup>。至其 邵學士家傳 ，則在推崇邵晉涵(1743-1796)生平學行之餘，有一段對清代考據學興起的重要論述，其言云：

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為空？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于是儒術日晦，而游談益興。雖間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 疇者，非果于自用，即安于作偽，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我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為之倡，然奧窔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又平，已百餘年，鴻偉倜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于惠君則讀其書，于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則雖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即足以歆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聖天子啟之，下之即謂出于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sup>31</sup>

在這一段敘述中，洪亮吉釋放出許多值得觀察的訊息，除了對元、明經學的批判，對清初大儒的讚譽之外；他特別對惠棟、戴震以及邵晉涵加以推崇，尤其將戴、邵二人與四庫開館一事聯結，更能證明筆者之前所言，乾隆盛世，漢學考據的興盛對宋、明理學及科舉制義之學產生了排擠效應，其情況即洪亮吉所言的「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sup>32</sup>需進一步說明的是，洪氏

<sup>28</sup> [清]洪亮吉著，劉德權點校：《書朱學士遺事》，《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3冊，頁1035。

<sup>29</sup> 洪亮吉著，劉德權點校：《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同前註，第1冊，頁190。

<sup>30</sup> 洪亮吉著，劉德權點校：《杭堇浦先生三國志補注序》，同前註，頁347。

<sup>31</sup> 洪亮吉著，劉德權點校：《邵學士家傳》，同前註，頁192。按：邵晉涵雖為存與乾隆三十六年會試所得士，亦曾與聞存與學術之精微，然其學術旨趣與存與不同。

<sup>32</sup> 按：有關《四庫全書》的纂修對乾、嘉學風轉變之意義，可參周康變編：《四庫全書之纂修研究》（香港：大東書局，1980年）；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劉漢屏：《略論四庫提要與四庫



此處所謂空談性命者，即大講綱常倫理的道學家，亦即馬積高所謂的庸俗理學<sup>33</sup>；至於從事帖括者，則是講時文之舉業家。然藉由八股文的縮合，此二者早已互為表？，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表達形式，並招致考據學家的嚴厲批判。舉紀昀之說為例，紀氏批評舉業家：「以講經求科第，支離敷衍，其詞愈美而經愈荒；以講經立門戶，紛紜辨駁，其說愈詳而經亦愈荒。」<sup>34</sup>另外，又指出道學家對人人責以孔、顏、思、孟，對事事繩以虞、夏、商、周，「名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於窒礙而難行」<sup>35</sup>。錢穆先生在觀察考據之風的興起與八股時文的關係時，曾歷引姚鼐、李兆洛、王昶、江藩之說，直指乾、嘉考據之風，乃激起於八股舉業，並以為此乃清儒之公言，可謂深識<sup>36</sup>。在考據學家眼中，舉業文章這種學問形式，不但不足以負載學術，更是禁錮人才的毒瘤。也因此，除了強烈批判之外，尚欲以新的學術形態取代之。正如漆永祥所言：「洪氏之語，將考據學由民間入朝廷，再由朝廷影響走向民間，並達到全盛的過程勾勒得非常形象而明晰。」<sup>37</sup>所以，考據學在乾隆盛世的大流行，基本上是由下而上的學術改革，然其意義則遠非單純的置於學術視野之下所可以涵蓋者。當然，從洪亮吉的敘述中，我們亦不難明白，他的學術取向已由原有科舉制藝的文章之學轉而為訓詁考據的經史之學。代表之作，除了《春秋左傳詁》之外，如《弟子職箋釋》、《漢魏音》、《比雅》、《六書轉注錄》、《傳經表》、《通經表》、《補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四史發伏》等，皆為其從事訓詁考據的成果，而洪亮吉亦已從文士一轉而為經生矣。

分纂稿的異同和清代漢宋學之爭，《歷史教學》1979年7期，頁40-44；楊晉龍：從四庫全書總目對明代經學的評價析論其評價內涵的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6期（2000年3月），頁523-583；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清代漢宋學的關係，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香港大學「明清學術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sup>33</sup> 馬積高：前言，《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頁8。

<sup>34</sup>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三》，收入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冊，頁53。

<sup>35</sup>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冊，卷89 史部·史評類存目·讀史管見，頁824。

<sup>36</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4章 顧亭林，頁139-141。

<sup>37</sup>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68。

必須指出的是，洪亮吉的走向考據之路，在常州並非單一的特例，孫星衍也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在《詁經精舍題名碑記》中，孫星衍開宗明義即強調「人才出於經術，通經由於訓詁」<sup>38</sup>。其實，大部分的常州學者都有科舉文章的根柢，其詩才文才，皆有聲於當時。尤其是孫星衍，袁枚（1716-1797）稱之為天下奇才，這當然不是指他的考據學業，而是稱許他的詩文。對於孫星衍的轉向考據之業，袁枚頗不以為然，屢致書規勸，最後竟稱其才竟不奇矣，以為不得不歸咎於考據<sup>39</sup>。而最能說明孫星衍從文人詞章轉向考據之路的，莫過於他發明許、鄭之學的心願。在與段玉裁的書信中，孫氏表達了願與段氏共明許、鄭之學的願望，他說：

僕生平好《說文》，以為微許叔重，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睹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僕嘗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僕近撰集《古文尚書馬鄭注》，庶此二十九篇之文，有專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偽書同立于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所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于天下也。<sup>40</sup>

究竟是何種力量，使詩才文才俱有聲於當時的孫、洪二人如此斷然的走向考據之路？這其實是一項頗為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以為答案就在二人的游幕生涯中<sup>41</sup>。考洪亮吉於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以四十五歲之齡榜眼及第，在此之前，為衣食之謀，曾游於朱筠、畢沅幕中。在朱筠的《笥河文集》中，常可見朱氏高舉「讀書必先識字」、「識字以通經」的口號<sup>42</sup>。所以，章學誠說他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sup>43</sup>，而江藩（1761-1831）則說他「說經

<sup>38</sup> [清]孫星衍：《詁經精舍題名碑記》，《平津館文稿》，卷下，收入《孫淵如詩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四部叢刊初編》影印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頁161。

<sup>39</sup> [清]袁枚著，王英中校點：《答孫淵如觀察》，《小倉山房尺牘》，收入王志英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冊，卷9，頁196。

<sup>40</sup> 孫星衍：《與段大令若膺書》，《問字堂集》，卷4，收入《孫淵如詩文集》，頁41-42。

<sup>41</sup> 相關記載可參孫星衍：《清故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洪君墓碑銘》、[清]江藩：《洪亮吉傳》、[清]蘇完恩：《洪北江先生遺集序》，收入《洪亮吉集》，第5冊，頁2368-2371、2387-2390、2399-2400。

<sup>42</sup> 如《說文解字序》云：「為文自識字始。」（[清]朱筠：《笥河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69）安徽試卷序則云：「先之以訓詁。」（同上書，頁77）勸學編序則言：「識字以通經。」（同上書，頁79）洪亮吉《朱學士遺事》則提到朱筠之言云：「讀書必先識字。」（《洪亮吉集》，第3冊，頁1035）

<sup>43</sup> 章學誠：《朱先生墓誌銘》，頁150。

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sup>44</sup>。除了自身的學術取向之外，朱筠對乾、嘉學術的影響，當是他對漢學的大力推動。即使不提他奏開四庫館的功績，也仍有可說者。如姚名達先生強調朱筠是乾、嘉樸學的開國元勳，是乾、嘉樸學家的領袖<sup>45</sup>。而尚小明則認為朱筠幕府的影響有三：其一，朱筠和他的幕賓大力提倡漢學，對漢學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其二，朱筠幕府為一培養和造就漢學家的場所。其三，朱筠幕府為畢沅幕府培養了人材<sup>46</sup>。至於畢沅，他嘗謂「經義當宗漢儒」、「文字當宗許氏」、「史學必通地理」、「金石可證經史」<sup>47</sup>，所著亦多詁訓經義，如《說文解字舊音》、《音同義異辨》、《經典文字辨證》等。與朱筠相同的是，畢沅將當時許多著名的學者延致幕下，加以獎掖，此舉對清代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sup>48</sup>。尤其幕主之學術傾向及對所愛好之學術的推動，當會對其幕客有所影響；而幕客之間的學術交流，更能使彼此眼界開闊，甚至相互學習。曾在朱筠幕中的乾、嘉著名學者，除了稍前所提到的邵晉涵之外，戴震、章學誠、王念孫、汪中、黃景仁(1749-1783)、武億(1745-1799)、錢坫(1744-1806)、莊炘(1735-1818)以及洪亮吉，皆同一時期在朱筠安徽學政幕內。後來，除了王念孫及戴震之外，上述諸人又先後追隨畢沅幕下於陝西、河南，再加上孫星衍、嚴長明(1731-1781)、程晉芳(1718-1784)、王復(1748-1798)、凌廷堪(755-1809)等人，可以想見出身常州文士集團的孫、洪二人，在幕中與考據學者的共事，對其學術轉變影響之鉅。所以，文章之士王芑孫(1755-1817)批評洪亮吉的從事地理考證之學是「誤隨風會」，當是深悉洪亮吉的學問根柢其實是辭賦文章之學，卻在客遊時受到漢學家的影響，轉而從事考據之業，並頗以能為訓詁考據之學自喜之故也<sup>49</sup>。劉德權提到洪亮吉在入朱筠幕後，從此與當時學者如戴震、邵晉涵、王念孫、

<sup>44</sup> [清]江藩撰，凌善清標點：《漢學師承記》(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卷4，頁23。

<sup>45</sup> 姚名達：《朱筠年譜序》，《朱筠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卷首。

<sup>46</sup>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92-93。

<sup>47</sup> [清]李元度：《畢秋帆尚書事略》，《國朝先正事略》(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卷20，頁8a-b。

<sup>48</sup> 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頁95。

<sup>49</sup> 王芑孫云：「君為古文，多振筆疾書，破去繩尺，所自命者然也。獨所為駢體文，今世第一，蓋君詞章實足以高天下，誤隨風會，作地理考證之學，世莫辨其疏密。君歿後，館臣修國史，以君入『文苑傳』，固得其真際云。」[清]王芑孫：《洪稚存集序》，《淵雅堂文續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81冊，總頁422。

章學誠、汪中、孫星衍等交最密，相與親摩，學識得力於此者頗多，並開始從事經學研究；而在畢沅幕中八年之間，則是與孫星衍交往最密，切磋經學，論學相長<sup>50</sup>。劉氏此說，當即是觀察到游幕生活對孫、洪二人的學術轉變，具有關鍵的影響力之故。

然而，當文士而從事學術研究，或由文士轉變為學者時，其早年所受的文章制藝之教，仍隱隱左右其學術態度。所以即使轉移興趣於學問，從事於考據之業，仍可見其好奇炫博之特色。例如孫星衍，其《尚書今古文注疏》，雖曰專門漢學，然仍可見其繁瑣與不善剪裁之敝，所以李慈銘批評他的學術心態中，有好奇炫博的因子<sup>51</sup>。至於洪亮吉，既推崇惠、戴之學，其《春秋左傳詁》亦詳於地理，多採古義，可補杜預之不足。然劉師培先生在稱許二人所著「精校詳釋，皆有扶微補佚」之功之餘，仍將孫、洪劃歸為文士之治經，說他們「學鮮根柢，惟記誦淵雅」<sup>52</sup>。觀李、劉二先生之意，或以孫、洪二人之治學，仍不脫文人習氣之故也。正如同考據家不善於八股文一般，文士所為考據之業，亦難入經生法眼，此或為彼此學問門徑最初的手處不同之故。是文士與經生之學術淵源，實有不能求其同者在焉<sup>53</sup>。

與孫、洪二人年輩相同的是莊述祖(1750-1816)。雖然與父親、伯父名冠天下的經術文章相比，莊述祖在筆力上頗有不如，但他在通籍之前，仍是循著制藝之途，用力於經術文章之上。莊述祖的轉而從事考據之業，是在他三十歲成進士卻

<sup>50</sup> 劉德權：前言，見《洪亮吉集》，第1冊，頁1。

<sup>51</sup> [清]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臺北：世界書局，1975年），頁823。

<sup>52</sup> 劉師培：南北考證不同論，《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第1冊，頁665。

<sup>53</sup> 此處可再舉一例言之。杜維運為其《趙翼傳》作序時云：「從治甌北史學到寫甌北長傳，最為甌北遺憾者，是他於史學的精確，若有不足。西方史學界所謂『不確實之病』，甌北蓋為感染者之一。其詩、其史、其平日記錄，都有由疏忽而引起的錯誤。甌北捷於思而敏於觀察，又以才士自居，談笑揮毫，千百言立就，斟量，推敲，修定，皆付闕如，以致其立論有待釐正者，其引書有與原文大相逕庭者。與其同時代謹慎小心的考據學家比起來，不像是生在同一世紀的人物。」（杜維運：序，《趙翼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頁16）按：在常州學者中，趙翼雖以史學名家，然其學問系統實與莊、劉、洪、孫諸人無異，同是循科舉文章之路而上的才士，故其治學，亦皆顯示出好奇廣蒐，議論重於舉證的一面，而患有「不確實之病」的共同特色。另外，杜氏在序中援引梁啟超對趙氏之評價，略謂趙能用歸納比較之法，以蒐求抽象史料，此法蓋即《春秋》屬辭比事之法。筆者以為使用方法並非關鍵，所持態度方為關鍵，從常州學者以考據方法治經，而所得與漢學家異，即可明其故。

無望進入翰林院深造之後<sup>54</sup>。從《珍藝宦遺書》來看，莊述祖本人也頗多以考據學方法行之的著作<sup>55</sup>，然而仔細分析，考據學方法對他而言，只是為其家學所宣言的聖王天道尋求證據的一項工具而已，他是不會為考據而考據的<sup>56</sup>。莊氏此一態度雖與孫、洪有別，然其著作亦脫離不了炫博好奇與龐雜之特色。他特好鐘鼎古籀，欲藉古文字之研究回復《歸藏經》，欲藉《夏小正》之研究以闡明家族聖王天道之說，所以仍免不了同孫、洪一樣招致譏諷與批評的命運。如李慈銘即云：

予嘗謂本朝經學極盛，而如孫淵如之酷信讖緯，主以說《詩》、《書》；劉申甫之言《春秋》，力主黜周據魯以《春秋》當新王之說，謂夫子借此行天子之事，損文用忠，變文從質，為通三統；及莊氏之以《夏小正》為《連山易》，皆意過其通，不免於驚世駭俗。其後姚姬傳倡言宋學，異論一出，方植之、陳碩士輩起而和之，至詆諸儒為異端，雖警談狂吠，就銷滅，而乘間抵隙，因緣為難，亦諸先生授之以口實也。<sup>57</sup>

蓋李氏以為宋學家之能有藉口以攻擊漢學，乃莊、劉、孫等人之說，意過其通，驚世駭俗所致<sup>58</sup>。巧合的是，莊、劉、孫以及洪亮吉等人皆為常州學者，亦皆有

<sup>54</sup> 莊述祖：《夏小正經傳考釋序二》，《珍藝宦文鈔》（道光年間莊氏脊令坊刊本），卷5，頁3；〔清〕宋翔鳳：《莊珍藝先生行狀》，《樸學齋文錄》卷3，收入《浮谿精舍叢書》（桃園：聖環圖書公司，1998年），總頁153。

<sup>55</sup> 按：述祖的著作共有《尚書今古文授讀》四卷、《尚書記章句》一卷、《尚書古今文考證》一卷、《尚書雜義》一卷、《校尚書大傳》三卷、《校逸周書》十卷、《書序說義考注》二卷、《毛詩授讀》三十卷、《毛詩口義》三卷、《毛詩考證》四卷、《詩紀長編》一卷、《樂記廣義》一卷、《左傳補注》一卷、《穀梁考異》二卷、《五經小學述》一卷、《五經疑義》一卷、《特牲餽食禮節記》一卷、《論語集解別記》二卷、《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十一卷、《明堂陰陽記長編》十卷、《古文甲乙篇》四卷、《甲乙偏旁條例》二十五卷、《說文古籀疏證》二十五卷、《說文諧聲考》一卷、《說文轉注》二十卷、《鐘鼎彝器釋文》一卷、《校正白虎通別錄》三卷、《史記決疑》五卷、《天官書補考》一卷、《校定孔子世家》一卷、《歷代載籍足徵錄》一卷、《漢鑄歌句解》一卷、《詩集》三卷、《文集》四卷。但觀其名目，頗易使人以為述祖所為乃考據之業，然考據但為其闡釋伯父莊存與所傳家族學術的工具而已，莊述祖學術之重心並不在此。

<sup>56</sup> 按：有關莊述祖援考據學方法以證家學所宣言的聖王天道之詳細內容，及其學術觀點與今文學萌芽之關連，請參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第5章。

<sup>57</sup>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頁821。

<sup>58</sup> 按：類似之說，《越縵堂讀書記》中實不少見，如論孫星衍有雜博之蔽（頁823）；譏臧庸解經多煩碎偏執（頁830）。李氏並以漢學之遭妄人掎擊者，實常州之臧氏、莊氏詒之口實耳。其說甚激烈，讀者可參之。又王利器編《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有李慈銘讀述祖《毛詩考證》之眉批，其中於卷一國風「鐘鼓樂之石經鐘作鍾」條下案語曰：「唐石經及宋刊本『鐘鼓』多作『鍾』，雖曰同音古或通用，實經典相承之誤也。『鐘』、『鍾』」

由文人而經生之背景。筆者以為，常州學者之所以治經屢遭批判，與其所業不純或有關連，然究其關鍵，或仍為早年所受制藝之學的牽制所致。

在治漢學的常州學者中，取得最高成就，而又不曾導致非議的，當推張惠言(1761-1802)，此蓋與其經學得明師傳授有關。張氏之治經，得力於皖派金榜(1735-1801)之授，此不爭之事實<sup>59</sup>；也曾批評科舉制度，認為這種制度埋沒人才，使「為士者日以嗜利而無恥」<sup>60</sup>。然張氏自言知學在三十以後，而悔其從前之用力於時文辭賦<sup>61</sup>，則是張氏與孫、洪、莊氏相同，早歲皆經歷一段為準備科舉考試的經術文章歲月。從文學成就來看，張氏被共推為常州詞派及陽湖文派的創始人；從經學成就來看，其《易》、《禮》之學亦有獨到之處。有不少學者將張氏所著《周易虞氏易》等著作歸納為專門漢學。其實，就筆者觀察，包括他的文學觀點、經學觀點甚至是聲韻學觀點<sup>62</sup>，是比較接近於常州莊氏的，此當與他早年和莊存與的子姪孫輩如莊述祖、莊綬甲(1774-1829)、莊有可(1744-1822)等時相過從，切磋制藝，商榷學問，有密不可分之關連。所以張氏於詩詞，講究意內言外<sup>63</sup>；於經典，亦不離聖人大義微言之追求<sup>64</sup>。意內言外正是阮元之師李道南(1713-1789)

---

二字迥別，又非『鍾』古而『鐘』今，何必『鐘鼓』字必作『鍾』，以淆人目乎？此等說出於臧庸、嚴可均輩，好古之蔽也。」見王利器纂輯：《越縕堂讀書簡端記續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8。

<sup>59</sup> [清]張惠言：《文稿自序》，《茗柯文三編》，收入《茗柯文》(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21。

<sup>60</sup> 張惠言：《送左仲甫序》，同前註，頁25。

<sup>61</sup> 張惠言：《文稿自序》，同前註，頁21。

<sup>62</sup> 例如丁履恆論張氏之古韻學曰：「張氏大指師法段氏，惟冬別於東，則宗孔氏，而別泰、怪以下五韻自為一部，說本莊氏述祖，實為竊獲。」([清]丁履恆：《形聲類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247冊，總頁248)又張成孫續纂其父張惠言繼纂述祖首創之《諧聲譜》，屢屢提及惠言引用莊氏之說，如論十一部(惠言分古韻為二十部)之入聲云：「江、段以配真，先君子用莊說配脂。」又論十六部曰：「先子云：『此部平、上聲字諸家皆合十二部為一，莊寶琛(述祖)分有平、上之聲各字為一部即此部，無平、上之聲各字為一部十二部。今以《詩》考之，良是。兩部合聲最近，亦可謂通用。』」[清]張成孫：《諧聲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247冊，總頁464、630。

<sup>63</sup> 張惠言：《詞選序》，《茗柯文二編》，收入《茗柯文》，卷上，頁26。

<sup>64</sup> 張惠言：《周易虞氏易序》，同前註，頁3；董士錫：《張氏易說後敘》，《齊物論齋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集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136冊，卷1，頁6-7，總頁751-752。

對莊存與治經獨得先聖微言大義的形容<sup>65</sup>，甚至有人戲稱詞出於《公羊》<sup>66</sup>，當有幾分理據。張氏之文學與經學觀點說穿了，都是注重儒學在政治教化這一現實功用的具體反映，而與其早年所受科舉制藝之教對儒學俗世價值的吸收，密不可分。

常州之從事漢學考據而尤需一提的學者是劉逢祿(1776-1829)。在筆者看來，劉氏可謂對考據學操入室之戈者。他純熟的運用考據學的方法義例，從事《公羊》學的研究，將莊氏家學推向學術的第一線。筆者從他的一系列《春秋》學著作中發現，他對《春秋》的討論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即以繼承自莊氏家族的學術觀點駁斥漢學考據家的學術觀，而所牽涉的既是經學與史學的對立，也是《公羊》學與《左傳》學的對立。從當時學術大環境的角度來看，既是莊氏家族學術觀點與當時考據學家治學觀點的對立，也是學術圈中的主流與非主流之對立。至於隱藏於背後的立論基礎，更是學術方法學論與學術價值觀的對立。簡言之，即學術正統誰屬的問題<sup>67</sup>。學者皆知，晚清經學的今古文之爭，乃是引發於劉逢祿以考據學方法對《左傳》及《穀梁傳》一系列的批判當中，然劉氏的經學觀實源於莊氏根源於制藝之教的學術觀點，此則少有道及者了。

總而言之，在考據學風潮的影響之下，許多著名的常州學者都有一條初學為制藝詞賦，後乃專力肆經的道路，如上列的孫星衍、洪亮吉、莊述祖、張惠言、劉逢祿等。只不過各家對考據學的態度不一，而顯現的學術內涵亦隨之有別罷了。追尋各家對考據學態度不一的原因，與是否重視自身原有的學術根柢，似乎是脫離不了關係的。惟有共通的一點是，各家之論著，仍摻雜著原有學術系統的痕跡。

<sup>65</sup> [清]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收入莊存與：《味經齋遺書》，卷首，頁1。

<sup>66</sup> 譚獻云：「魯川（馮志沂）謂予曰：『子鄉先生龔定庵言：「詞出於《公羊》。」此何說也？』予曰：『龔先生發論，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內言外之旨，亦差可傳會。』」（[清]譚獻著，顧學頡校點：《復堂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48）又吳宏一先生在《常州派詞學研究》中提到：「據《清史稿》、夏寅官譚獻傳和譚獻亡友傳的記載，莊棫（中白）和譚獻讀書、治經『必求諸儒微言大義，不屑屑章句』，這種治經態度和以寄託說詞，正是一路。」詳參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206。

<sup>67</sup> 拙作：劉逢祿春秋學初探——從春秋論談起，《中國哲學》第25輯（排印中）。

### 三、臧庸對漢學考據的擁護

身處乾、嘉之際的臧庸與李兆洛，可以說是常州學者學術傾向的兩個極端。分析兩人之學術傾向及其學術傾向所以致異之因，將有助於進一步說明常州學者面對考據學思潮時的複雜態度。而乾、嘉之際的常州文士，為強化自身所學的學術價值，以因應考據潮流之衝擊，所形成之特殊學風及其意義，亦可藉由對二人學術之分析而更形明確。

藉著在書院執教的機會，盧文弨可以說是乾隆晚期江南地區考據學的推手；而莊氏家族也在莊存與辭世之後，仍然以各種形式堅持著追求聖王微言大義之學。臧庸與李兆洛雖曾同師於盧文弨，也同樣與常州莊氏家族關係密切，然而前者擁抱漢學，畢生以考據輯佚為職志，後者則堅持常州原有的學術傳統與批判漢學考據的態度，與前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分析二人學術所以致歧的根本原因，仍是制藝文章之教與考據學價值觀的對立所致。從年譜及文集來考察二人之學問歷程、論學態度、學術價值觀以及與當時學術界的互動情形，皆可以看出兩人在這一點上的分歧。

據吉川幸次郎所輯《臧在東先生年譜》<sup>68</sup>引臧氏自記及他人所記，可知臧庸在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十九歲之時，其學問興趣產生關鍵性的變化，即從習舉子業轉而習漢學，尤其是鄭氏學。如《年譜》在「五十年乙巳十九歲」條下云：

厚庵公（臧庸父）教子極嚴，有過朴責不少怨，延端士為之師，課以舉子業。  
錢氏 布衣墓誌銘 是歲，先生受業鄭氏環。 皇例贈文林郎府學增廣生員蘇景程先生行狀 見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好之。讀高祖玉林公《經義雜記》等書，始恍然  
有悟。 先師漢大司農北海鄭公神座記 知研究經學必以漢儒為宗，漢儒之中尤必折  
中於鄭氏。 上王鳳喙光祿書 遂盡棄俗學而專習鄭氏學。 鄭公神座記<sup>69</sup>

比上述洪亮吉、孫星衍、莊述祖、張惠言等人學術轉向的年紀還要早，在弱冠之前，臧庸即放棄了常州士子慣有的經術文章之路，目之為俗學，並轉而從事漢學考據。此舉影響了他的一生。在往後的二十五年歲月中，臧氏所業不出漢學考據，所交不出樸學專門名家，為乾、嘉考據學之繁盛，貢獻了一生的心力。舉其

<sup>68</sup> 吉川幸次郎：《臧在東先生年譜》，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第16冊，頁232-260。

<sup>69</sup> 同前註，頁234。



大凡，如從二十歲起治經學，創端《月令》，據《呂氏春秋》以校《小戴記》，得到塾師鄭清如(1730-1806)以及之前臧氏時往請益學問的莊述祖之讚許。也就在這一年，他有機會一見常州大儒莊存與，成為日後撰寫《禮部侍郎莊公小傳》的一大動機<sup>70</sup>。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臧庸二十二歲，盧文弨先生來常州主龍城書院，其父命從游盧氏門下，乃以《月令雜說》請正，盧氏稱許他日學業將高於己，臧氏感其言而執弟子之禮<sup>71</sup>。從《年譜》中我們可以發現，臧氏從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到五十六年(辛亥，1791)在盧氏門下的三年間，得識當時漢學大師如劉端臨(1751-1805)、錢大昕、段玉裁等，並從事大量古籍的校勘及輯佚工作，如校錄玉林先生的《經義雜記》、參與審正參訂畢沅刻盧氏所校《呂氏春秋》及《經典釋文》，又輯錄《爾雅漢注》、漢盧氏《禮記解詁》，又成《毛詩注疏校纂》、《尚書注疏校纂》、《周易注疏校纂》，參與纂修郡志，並箋記段玉裁之《詩經小學》。其間，還因舊日所輯《論語鄭注》，其「自行束脩」章採《後漢書·延篤傳·注》之說，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參與討論之人有盧文弨、洪亮吉、顧子明(生卒年不詳)，最後由趙懷玉(1747-1823)輯諸人之論，成《論語束脩說》一書<sup>72</sup>。乾隆五十七(壬子，1792)、五十八年(癸丑，1793)間，臧庸除與鈕樹玉(1760-1827)、袁廷樞(1764-1810)、顧廣圻(1770-1839)、瞿中溶(1769-1842)、費士璣(生卒年不詳)、李銳(1769-1817)等人訂交之外，也從錢大昕、段玉裁、王昶、王鳴盛問學，其間所業，亦不外校勘《十三經》、《經典釋文》，並纂《三禮目錄》、《華嚴經音義錄》，又補校梁玉繩(1744-1819)《左傳通》。最後因錢大昕、王昶之薦，赴楚授學沅孫蘭慶經<sup>73</sup>。乾隆五十九(甲寅，1794)、六十年(乙卯，1795)間，臧庸因畢沅之遷調而往來山東、湖北，因劉端臨之介而認識阮元。嘉慶初，阮元督學浙江，即延臧氏助輯《經籍纂詁》，其間臧氏獲交錢大昭(1744-1813)、丁杰(1738-1807)，各為校訂所著。並輯蕭錄該《漢書音義》，段玉裁曾助為勘正謬誤<sup>74</sup>。《經籍纂詁》完成之後，即刊刻《華嚴經音義錄》、《四庫全書通俗文字》、雪窗書院本《爾雅》、《詩經小學錄》，又因阮元之助，刊刻《經義

<sup>70</sup> 臧庸：刻蔡氏月令章句敘、禮部侍郎莊公小傳，《拜經堂文集》，卷2，頁6、卷5，頁1。

<sup>71</sup> 吉川幸次郎：《臧在東先生年譜》，頁234。

<sup>72</sup> 同前註，頁234-237。

<sup>73</sup> 同前註，頁237-238。

<sup>74</sup> 同前註，頁239-240。

雜記》<sup>75</sup>。從嘉慶五年（庚申，1800）至十五年（庚午，1810）逝世之間，臧庸所業仍不外是校刊、考證、輯佚、纂書。如嘉慶六年（辛酉，1801），阮元校刊《十三經注疏》，招臧庸與其事；次年，校宋咸熙間刊呂氏《古周易音訓》輯本，並作序；嘉慶九年（甲子，1804），王引之（1766-1834）屬臧氏校任大椿（1738-1789）《字林考逸》，又校唐釋湛然《輔行記》，並成《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湣王之訛；嘉慶十年（乙丑，1805），成《毛詩馬王徵》，為阮元校補《經郭》，並因《拜經日記》卷四言《詩經》字字有韻一事，與陳壽祺（1771-1834）、王引之相互論難；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應阮元聘，至揚州纂輯《揚州圖經》，並校劉端臨遺書。嘉慶十二年（丁卯，1807），至浙江，應劉鳳誥（1761-1830）之聘，編次《五代史記注》；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阮元復撫浙，續得劉端臨《經傳小記》、《文集》，編定遺書凡八卷，屬臧庸校字；嘉慶十五年，為應順天鄉試，北上過德州，下榻孫星衍處，與孫氏及洪頤烜（1765-1837）同校《管子》，約簽記六七百則；並與洪頤烜一同覆勘孫氏《史記天官書考證》、討論孫氏所著《尚書義疏》；落第之後，寓吳烜（1760-1821）家，為之纂《中州文獻考》，並校定汪德鉞（1748-1808）遺書；時王念孫罷官居都下，與臧庸所居接近，故臧氏得朝夕請益，並得交秦瀛（1743-1821）、郝懿行（1757-1825），日以經史古義相研，樂此不疲，兀坐成疾。嘉慶十六年（辛未，1811），因王氏父子之屬，校任大椿《小學鉤沉》，同時仍纂輯《中州文獻考》，並編校汪氏遺書；至四月間病瘧，五月猶篤學不倦；七月，卒於吳氏館，享年四十五歲<sup>76</sup>。所以，在臧庸並不算長的歲月中，他實際上是藉漢學考據的知識謀生活之所資，並以其專業能力而為當時漢學家如畢沅、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等人所肯定。從《年譜》的記載可以看出，其轉向考據之業的年紀實較孫、洪、莊氏諸人為早，這意味著受科舉制藝之學的訓練與影響亦較諸人為淺。觀其所交往，盧文弨、江聲（1721-1799）、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段玉裁、畢沅、江藩、鈕樹玉、顧千里、黃丕烈（1763-1825），或出身蘇州，或定居於蘇州，或與蘇州關係密切者；至於揚州劉氏、阮氏、焦氏以及高郵王氏，尤為論學之友。所以臧庸雖身為常州人，然可謂乾、嘉學術的旗手，阮元所主持的《十三經校勘記》，其中《周禮》、《公羊》、《爾雅》這三經的《校勘記》，即成於臧庸之手；阮元的《經籍纂詁》，也是由他擔任總纂的。且筆者觀其文集，有一與孫、洪諸人文集絕異之處，即未嘗有詩賦之作，而幾全為論學之語，此或與其早

<sup>75</sup> 同前註，頁 240-241。

<sup>76</sup> 同前註，頁 241-248。

歲即投入校讎之學，而較少用心於詩賦文章有關。臧庸一生屢試不第，要亦不離此因。至其《拜經日記》，王念孫序之曰：

《拜經日記》十二卷，考訂漢世經師流傳之分合，字句之異同，後人傳寫之脫誤，改竄之蹤跡，擘肌分理，剖豪析芒，其可謂辯矣。《日記》所研究者，一曰諸經今古文，二曰王肅改經，三曰四家《詩》同異，四曰《釋文》、《義疏》所據舊本，五曰南北學者音讀不同，六曰今人以《說文》改經之非，七曰《說文》？脫之字。而於孔、孟事實，考之尤詳。若其說經所旁及者，叔孫《禮記》、南斗文昌之類，皆確有根據，而補前人所未及。夫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於今者則寶貴之，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辯，或以為細而忽之，得好學如用中者，詳考以復古人之舊，豈非讀經之大幸哉！<sup>77</sup>

王念孫之序，既已概括臧氏著作之大凡，而臧氏之所論所言，亦無非根於漢學之立場。至於校刻古籍，刊正異同，此又不僅臧氏之所擅，實為其謀生之所資。簡言之，臧氏所為，無愧於漢學考據之目，且為乾、嘉之際，常州學為漢學之最徹底者。宋翔鳳詩云：「蕭然樸學世誰稱，盡削繁枝據上層。滿座儒林看奪席，幾家《詩》說得傳燈。」<sup>78</sup>要亦推崇臧氏的樸學成就。段玉裁以臧庸學識遠超孫、洪之上<sup>79</sup>，吉川幸次郎以為段氏之獨稱臧氏，乃非過譽之詞<sup>80</sup>，其故或亦在此。

所以，在臧庸的學術觀念？漢學、鄭玄、訓詁、《爾雅》、校讎、宋本，殆最為其所樂道者。如錄爾雅漢注序云：「夫治經必先通訓詁，故《爾雅》者，六藝之權輿也。治《爾雅》者，必根本漢學，而後參考之郭氏，則此書又《爾雅》之權輿也，學者其知所先後歟？」<sup>81</sup>又如與葉葆堂書云：「弟僻嗜漢儒之說，溺于文字章句之末。」<sup>82</sup>其上王鳳喈光祿書則云：「知研究經學，必以漢儒為宗，漢儒之中，尤必折中於鄭氏，試操此以參考諸家之言，遇鄭氏與

<sup>77</sup> [清]王念孫：拜經日記序，《王石臞先生遺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卷2，頁4，總頁39-40。

<sup>78</sup> 宋翔鳳：秋日懷人詩·臧在東文學庸，《憶山堂詩錄》，卷4，收入《浮谿精舍叢書》，總頁194。

<sup>79</sup> 臧庸：刻詩經小學錄序，《拜經堂文集》，卷2，頁4。

<sup>80</sup> 吉川幸次郎：臧在東先生年譜後序，《臧在東先生年譜》，頁257。

<sup>81</sup> 臧庸：錄爾雅漢注序，《拜經堂文集》，卷2，頁12-13。

<sup>82</sup> 臧庸：與葉葆堂書，同前註，卷3，頁70。

諸家異者，畢竟鄭氏勝之。」<sup>83</sup>其 題凌次仲教授校禮圖 言凌廷堪 (1755-1809) 之論禮，精意卓識，能貫通全經，而未始不由校讎文字間，漸入闡奧<sup>84</sup>。至於對宋本的喜好，則又與其校讎事業密不可分，而於 重雕宋本爾雅書後、 校宋槧板爾雅疏書後、 書吳元恭本爾雅後、 周易注疏校纂序、 尚書注疏校纂序、 毛詩注疏校纂序、 書宋槧左傳不全本後、 校影宋經典釋文書後、 書左氏音義之六校本後 等文中，一再強調之。

敘述至此，當可明白，臧庸乃以經生自況，蓋已無可疑。更何況他在 別郭頻伽序 中也提到，自列傳分「儒林」、「文苑」後，經生與才子常不合。然漢末蔡邕固才子，康成固經生，兩人卻能有相契之交；言下之意，蓋臧庸乃以蔡、鄭之交情況已與郭也<sup>85</sup>。值得一提的是，臧庸雖以經生自況，卻並不表示他就無功名之念。臧庸一生曾參加過三次鄉試而皆落第，一次為二十八歲（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時參加江南鄉試，另兩次則分別為三十八歲（嘉慶九年甲子，1804）與四十四歲（嘉慶十五年庚午，1811），參加順天鄉試。考察臧庸落第的原因，仍與其對制藝文章之態度有關。臧庸曾自言：「庸雖溺志於訓詁考訂，未嘗不有意於文章。」<sup>86</sup>然亦言自己試藝不規規於墨腔試調，不類場屋文字，當見擯於有司<sup>87</sup>。考據學前輩惠棟在乾隆九年（甲子，1744）應鄉試時，逾越朱熹《四書集註》的範圍，引用《漢書》語立論，其結果當然是見擯於有司<sup>88</sup>；臧氏則是在 子夏易傳序 中，提到自己在順天鄉試時，因堅持《子夏易傳》為韓嬰所作而被黜之事<sup>89</sup>。並於 跋宋虞廷會試卷後 大發同情之慨，其言曰：

此文之根據《說文》、《禮記注》、《三禮記目錄》，為合乎本經，而不依隨今日之《集解》、《集注》，則非究心經學詁訓之深者不能辨，無論售否，終恐當世鮮能心知此文所以精妙之故，因為跋其尾，如是虞廷無以得

<sup>83</sup> 臧庸： 上王鳳喙光祿書 ，同前註，頁 2。

<sup>84</sup> 臧庸： 題凌次仲教授校禮圖 ，同前註，卷 4，頁 6。

<sup>85</sup> 臧庸： 別郭頻伽序 ，同前註，頁 25。

<sup>86</sup> 臧庸： 答秦小峴少司寇書 ，同前註，卷 3，頁 61。

<sup>87</sup> 臧庸： 答翁覃谿鴻臚卿書 ，同前註，頁 68。

<sup>88</sup> [清]王昶： 惠定宇先生墓誌銘 ，《春融堂集》（嘉慶丁卯塾南書舍刊本），卷 55，頁 1。

<sup>89</sup> 臧庸： 子夏易傳序 ，《拜經堂文集》，卷 2，頁 1。

失為欣戚也。<sup>90</sup>

蓋臧庸之說，或亦以己之違於眾人所見，堅持子夏為韓嬰之論，致遭廢黜，而有感於宋氏（宋翔鳳：1776-1860）此文。然言下之意，亦不滿於科場主事者專以《集解》、《集注》為據，而不能容於漢學訓詁之說。至其與陳雪香少司寇書，則頗有酸氣，乃以為場外知己猶勝場中一文<sup>91</sup>。而刻庚午落卷跋則自我調侃，言己落第之幸，使落卷可以懸諸國門<sup>92</sup>。所以，對於王念孫勉之以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臧庸只能答言：「於學問一塗，粗涉津涯，或能黽勉萬一，至舉業荒落，科名或有辜雅望也。」<sup>93</sup>

從這看來，臧庸之落第，還是與其對通行的制藝文章的疏離有關。還有兩篇文章可以證明臧庸在心態上對制藝文章的疏離，首先是與顧子明書。在信中，他要求顧文炳先辨其志：是志在讀書？還是志在科名？若志在讀書，則當先通詁訓，始能治經，遵信兩漢大儒說如君師之命弗敢違。臧庸強調此舉用意非在篤信漢儒，而是因為三代以下，漢最近古，其說皆有所受，故欲求聖人之言，舍此無所歸。臧庸認為此可必之於己，得之足以自樂，有功於先哲，有造於來學，而願顧氏為之無倦。至於富貴，則是偶然之遇，為之勞心費神，窮年累世，而遇者少不遇者多。一旦僥幸得之，雖可以誇耀世俗，然品誼不修，學業不講，常為有識者所鄙。不幸而畢生帖括，以免園冊子自終，《十三經注疏》至不能舉其名目姓氏，其時文即高出於汪、歸、金、陳之上，蓋亦無足用。故臧庸在信末乃云：「此鏞堂所不願足下為者也。」<sup>94</sup>其次是與丁道久書。在信中，他對丁履恆（1770-1832）之猶豫於文士經生之間，致兩無所成，深感惋惜。其言云：

足下之聰明才識，吾黨所僅見者，豈特鏞堂勿如已哉！但鄙念屬望於足下者，非特恃聰明以肆力詞章而已，即足下自命，當亦不徒在此也。蓋吾儒之事業，以聖人為歸。孔子，聖之至也；《六經》者，孔子所手定，以惠萬世學者，而亦群聖精神之所寄也。故有志正學者，皆當求之《六經》。

<sup>90</sup> 臧庸：跋宋虞廷會試卷後，同前註，卷4，頁9。按：當時有許多常州學者徘徊於一種兩難的局面當中，即究竟應轉向致力於漢學訓詁之業，還是專力於原有的詩賦文章之路？有許多人採取二者兼採的方式，如宋翔鳳、丁履恆、陸繼輅等人，一方面致力於詩文的創作，一方面也從事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其結果則是科舉受挫，亦無法以學術名家。

<sup>91</sup> 臧庸：與陳雪香少司寇書，同前註，卷3，頁88。

<sup>92</sup> 臧庸：刻庚午落卷跋，同前註，卷4，頁30。

<sup>93</sup> 臧庸：與王懷祖觀察書，同前註，卷3，頁79。

<sup>94</sup> 臧庸：與顧子明書，同前註，頁73。

治經之法，必先通聲音詁訓，此足下所知者，然非研精極神，忘寢廢食，盡心力為之，則亦不能有成。足下非不好此，但為之不勤，或一時發銳進之心，未旬月已退，或方從事於此，忽念及彼，遂輟此為彼，若是輾轉，虛靡歲月。足下又多憂多病，則并此無益之功，亦不可得矣。鏞堂以為，窮達命也，非人所能必。所可必者，學問之事耳。使吾黨移研經之力，肆力詞章，詞章即工，或不能得一第，為顯揚之資，終屬無用，而又坐廢不朽之業，是兩失也。至應酬無益之舉，尤足荒功逸志，即肆力詞章者所當屏絕，況有志正學者哉！<sup>95</sup>

在這兩封信中，臧庸一再強調治聲音詁訓之經學，乃不朽之業，至於詞章，即使高出於汪、歸、金、陳之上，若不能得一第，終屬無用。就算僥幸得之，然學業不講，亦常為有識者所鄙。言下之意，乃是不承認制藝文章為學問，此或為他屢試不第的過激之言，畢竟他還是不能忘情於科場。與臧庸、顧子明、李兆洛一樣，丁履恆亦為盧文弨龍城書院的弟子，然由丁氏回信觀之，他的學術態度與李兆洛相同，而異於臧庸、顧子明。今觀其言曰：

夫學事之本末，其故可得而詳也。三代之時，以力行為先，學文為後。西漢大儒，專業《六經》，而文章即附以行。至東漢經生，以章句名家，則有通經義而文章或不傳者矣。下迨唐、宋，多載道之言，而經學或弗深講，自是以降，或皓首窮經，而其言不著；或采擷詞華，而實學鮮究。蓋文章之與經術分也，其所從來舊矣，非至今日也，矧今之所為文章者何如哉！恆意苟肆力於文章，則必玩索經文，得其大體，為讀書明理之文，下亦漱六藝之芳潤，以為高文典則，而浮薄譁譁，所宜深屏也。若研究乎聲音詁訓，以蘄明白乎經之義理，則將期之白首，而應制舉之文，及詩賦詞章，遂舍棄弗務，然後用志不紛，而所得者深也。<sup>96</sup>

由丁氏回信之內容觀之，他所認定的學術理想，乃在西漢大儒，所謂專業《六經》，而文章即附以行者也；至於東漢以下，文章經義分途，則不為所取。所以他要的是玩索經文，得其大體，為讀書明理之文，而不只是研究聲音詁訓而已。事實上李兆洛亦主此一觀點，其《洞簫樓詩紀序》以為自「史家列傳有『儒林』、『文苑』之目，而詞章、經術，若分兩途，或鄙經生為樸學，或黜文士為浮華」。

<sup>95</sup> 臧庸：《與丁道久書》，同前註，頁74。

<sup>96</sup> 附《丁道久答書》，同前註，頁76。

然李氏認為：「魁傑之士，未嘗不兼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也。」<sup>97</sup>所以當臧庸還在為其高祖能否入「儒林傳」而向阮元據理力爭時，宋翔鳳即去書駁之，略謂：

鄙意以諸經博士廢，即不得有「儒林」。「儒林」者，守一師之言，以教授弟子，俾家法之勿墜，故生則官以博士，歿則傳以「儒林」。若會通眾家，自闢蹊徑，議論足以開世務，著作可以緯萬物者，即不以「儒林」囿之。如遷之於孟、荀；固之於賈、董、劉、楊；蔚宗之於康成、賈逵是也。今之博士非古之博士，則「儒林」之傳，又烏能以稱？<sup>98</sup>

原李氏、宋氏之意，蓋以為惟有會通眾家，自闢蹊徑，合經術文章為一，使其議論足以開世務，著作可以緯萬物者，方為彼輩所深心服膺之學，若「儒林」章句之學，則不在所願為之列，此蓋常州文士所自負者，亦由此而見其不同於考據學的學術態度。至於丁氏的回信，頗能令人聯想到他與常州莊氏的關係。莊存與銘其齋中屏聯云：「玩經文，存大體，理義悅心；若己問，作耳聞，聖賢在座。」<sup>99</sup>丁履恆是莊存與的孫女婿，存與長子莊逢原（1735-1795）之婿，是莊綬甲的姐夫，也是授業師，更是與莊綬甲、劉逢祿共習莊氏學者<sup>100</sup>。了解丁氏與莊氏的這一層關係之後，對於他主張玩索經文，得其大體的學術態度，就大致能了然於胸了。

#### 四、李兆洛對科舉之學的堅持

與《臧在東先生年譜》內容大異其趣的是，蔣彤《武進李先生年譜》所記，乃以兆洛之應舉為官為經，學術及學術事業為緯。而其學術內容與學術事業，又與臧庸或乾、嘉學者所為之漢學迥異。綜觀李兆洛一生，與其學術事業較有關連者，約為四十歲（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為官鳳臺以前，以及五十五歲（道光三年癸未，1823）入主暨陽書院以後。在為官鳳臺以前，李兆洛的生活內容幾與應舉有關，而其學術傾向亦在此一時期即已定型。舉其要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十五歲，學制藝文，好《資治通鑑》、《文獻通考》。《年譜》云：

<sup>97</sup>〔清〕李兆洛：《洞簫樓詩紀序》，見宋翔鳳：《洞簫樓詩紀》，收入《浮谿精舍叢書》，總頁235。

<sup>98</sup>宋翔鳳：《與臧西成書》，《樸學齋文錄》，卷1，總頁129。

<sup>99</sup>〔清〕莊勇成：《少宗伯養恬兄傳》，《毗陵莊氏增修族譜》（光緒元年刊本），卷30，頁29。

<sup>100</sup>〔清〕劉承寬：《先府君行述》，見〔清〕劉逢祿：《劉禮部集》（道光十年劉氏思誤齋刊本），附錄，頁1-11。

「先生英敏絕特，每制一藝，稍不當父師意，則更為之。或一題成五、六篇，不終日而就。好讀司馬文正《資治通鑑》及馬端臨《文獻通考》。不期年而貫澈首尾，其節目要處皆能成誦。後常舉以訓門弟子曰：『讀書有至簡要、至闊大一法，《通鑑》以知人，《通考》以博物，一經一緯，稍有才分，何患不一日千里？』」<sup>101</sup> 蓋乾、嘉之際，學者多以漢學相標榜，李氏則獨標《通鑑》、《通考》，為文士泛覽博通之所資。故魏源 武進李申耆先生傳 即云：

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甚。蘇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孫氏，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戴氏、程氏，爭治詁訓音聲，爪剖鉅析。視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南雷、萬季野、全謝山諸公，即皆擯為史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于無用之一途。武進李申耆先生生于其鄉，獨治《通鑑》、《通典》、《通考》之學，疏通知遠，不囿小近，不趨聲氣。<sup>102</sup>

魏氏所論，即是以李氏之獨治《通鑑》、《通典》、《通考》之學，乃是有意自外於漢學考據的學術系統之外。又《年譜》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二十一歲，李氏「肆業龍城書院，講者為餘姚盧學士文弨，學者稱為抱經先生者也。

在龍城時，臧在東鑄堂、顧子明文炳頗任校讎役，講訓詁學，先生意殊不屑，學士深器異之」<sup>103</sup>。又 抱經堂詩鈔序 云：「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先生主講常州之龍城書院，兆洛才弱冠，從受業，講習制舉文而已，於先生之學無所窺也。同几席者，臧在東、顧子明，頗能研求一二，私心喜之，不能專意。」<sup>104</sup> 從這兩則記載來看，不論李氏對於校讎訓詁之學是「意殊不屑」，或是「私心喜之，不能專意」，至少可以說明李兆洛與臧庸在為學興趣上的大不相同。

所以自此以後，臧庸即以訓詁校讎自任，而李兆洛則繼續其科名之路，尤其是與志同道合者結為文社，相互砥礪學習。例如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李

<sup>101</sup> [清] 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9。

<sup>102</sup> 魏源： 李申耆先生傳 ，《魏源集》，頁358-359。按：李兆洛教人讀書當讀《通鑑》、《通考》之記載，除《年譜》、《文集》之外，蔣彤《暨陽答問》卷三、卷四亦有數處言及。《暨陽答問》乃兆洛晚年與蔣彤之問答錄，據此可知兆洛自少至老，於《通鑑》、《通考》之學，態度一致。

<sup>103</sup> 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頁10。

<sup>104</sup> [清] 李兆洛： 抱經堂詩鈔序 ，《養一齋文集》（光緒四年湯成烈重刊本），卷5，頁7。又李兆洛在 張漢賓杞軒詩集序 中亦云：「抱經盧先生主講龍城， 曩時同遊者，如臧在東、顧子明，皆能通訓詁，學有所述造，表見於世。」（《養一齋文集》，卷3，頁32）



氏二十二歲，與江陰祝筱珊（1764-1827）訂交。祝筱珊字子常，是愛日草堂的主人。陸寶千對愛日草堂在乾、嘉之際的歷史地位予以很高的評價，指出草堂諸子的相互砥礪，是常州學派的萌芽之因<sup>105</sup>。草堂之成員，主要有張惠言、張琦（1764-1833）、祝筱珊、陸繼輅（1772-1835）、陸耀燾（1771-1836）、莊綬甲、劉逢祿、洪貽孫（1773-1816）、丁履恆、周伯恬（1777-1846）、吳育（1780-?）與李兆洛等<sup>106</sup>，值得注意的是，草堂諸子的成員當中，惟獨沒有臧庸。郭嵩燾（1818-1891）提到：「乾、嘉之際，士皆尚文章，馳騫聲利。於時常州尤獨多文士，而草堂諸君子獨以立身砥行相為勸切，風尚為之一變。」<sup>107</sup>其實草堂諸子即為當時眾多文士之一，其「斐然以發名成業相砥礪」者<sup>108</sup>，仍以藉八股登科名為目的，只不過較碌碌餘子多了一份志向及操守而已。這一點，從李兆洛身上即可清楚看到。例如在三十歲的嘉慶三年（戊午，1798），李氏曾致書與祝子常，其言曰：

日來留意八股，屏棄一切，頗覺意有餘閒。憶往時希心涉獵，兀對几案，寒忘衣，饑輟餐，聞外事則腦欲裂，然其所省覽，迨今數之，芸芸然，瑣瑣然，不能自主也。勞逸之故，形神之辨，動靜損益之消息，於此自領，蓋才餘於其事則見樂，不足者苦之。洛之才僅可於八股見餘耳。<sup>109</sup>

又《年譜》載嘉慶六年（辛酉，1801），李氏三十三歲，連試仍黜，作詩貽子常有「賈傳始弱冠，終軍亦妙年。吾今已過之，偃蹇行自憐。非怨遇合遲，吾學實未全。道高身自尊，進退非徒然。」云云<sup>110</sup>。又嘉慶十年（乙丑，1805），三十七歲。殿試第五，授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協修。致書與子常諸故人曰：「荷諸君子教益，幸得廁選禮闈，雖折花上苑，僅得卑枝，而自省褊材，實已逾分，一日先鞭，聊為負弩，敬留前席，以待諸君。大名不可倖邀，快意尤恐多辱，諒吾兄亦為洛幸之耳。（陸）祈生、（周）伯恬需此甚急，而竟不得，命也何如。」<sup>111</sup>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李兆洛在通籍之前的生活重心，即為準備科舉考試。與

<sup>105</sup> 陸寶千：《愛日草堂諸子——常州學派之萌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

<sup>106</sup> 按：此處據《郭嵩燾日記》、李氏《孝廉方正祝君行狀》所記言之。〔清〕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6；李兆洛：《孝廉方正祝君行狀》，《養一齋文集》，卷12，頁29。

<sup>107</sup>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頁6。

<sup>108</sup> 李兆洛：《孝廉方正祝君行狀》。按：此文傳主即《郭嵩燾日記》所言之祝筱珊。

<sup>109</sup> 李兆洛：《與祝子常》，《養一齋文集》，卷18，頁11。

<sup>110</sup> 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頁18-19。

<sup>111</sup> 同前註，頁21-22。

漢學家「治經之暇，便習時文」、「攷古之餘，兼求制藝」<sup>112</sup>，甚至通籍之後即棄八股於不顧，視八股所代表之義理價值如蔽屣的態度不同的是，八股制藝代聖人立言所隱含的世俗化價值，並未因李兆洛通過科舉考試之後即遭其遺棄，反而更堅定其立場。如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李氏三十八歲。授徒家塾，顏其堂曰「耕樂」，書塾曰「辨志」，並為之銘曰：「惟士尚志，所志者道。聖賢在座，天地在抱。萬化非多，一經非少。存存萌萌，良貴是保。志有不立，辨之宜早。玩細遺遠，求安求飽。歧能亡羊，貪乃喪寶。載銘爾室，中以自考。」蔣彤云：「蓋先生進身之初，夙夜自盟者若此。」<sup>113</sup>值得注意的是，李氏顏其書塾曰「辨志」，此「辨志」之名與莊述祖書塾之名正相同<sup>114</sup>，而李兆洛鄉試中舉的試卷中，曾以古「𠄎」字替代今之「算」字，此「𠄎」字在莊述祖《夏小正》之學中，具有特殊的意義<sup>115</sup>，李氏蓋有聞於莊氏之學者<sup>116</sup>。

在李兆洛五十五歲（道光三年癸未，1823）主講暨陽書院以前，仍有一事可說者，即《駢體文鈔》之編纂。此編首事於成進士之次年（道光十一年丙寅，1831），授徒之餘，「以臺閣中多用駢體，乃頗肆力於漢、魏六朝之文，又選閱自漢以來至國朝名臣表奏碩儒論議，其文辭醇茂而章程明切者錄之」<sup>117</sup>。是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所錄，皆廟堂之制，所謂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中編所錄則指示述作之意，故所選或慎密而端慤，或豪侈而灑蕩。蓋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濟以比興，則詞不迫切，資以故實，故言為典章也。下編多緣情託興之作，往往託思於言表，潛神於旨？，引情於趣外<sup>118</sup>。筆者以為，李氏選錄《駢體文鈔》之用意，非僅為指示文章作法而已，必蘊有特殊的價值理念於其中。蓋文章即學問，此固科舉文人最根本之觀念，也是李氏特別強

<sup>112</sup> [清]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上洗馬翁覃溪師書》，《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22，頁195。

<sup>113</sup> 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頁22-23。

<sup>114</sup> 按：臧庸云：「莊葆琛先生顏其書塾曰『辨志』，此二字仍學者頂門一針。」見臧庸：《與顧子明書》，《拜經堂文集》，卷3，頁73。

<sup>115</sup> 莊述祖：《夏小正經傳考釋序二》，《珍藝宦文鈔》，（道光乙未年莊氏脊令坊藏板），卷5，頁3。

<sup>116</sup> 其詳可參李兆洛：《珍藝先生遺書序》、《莊珍藝先生傳》、《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拾遺補藝齋遺書序》等，《養一齋文集》，卷3，頁18、卷13，頁5、卷12，頁31、卷4，頁26。

<sup>117</sup> 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頁23。

<sup>118</sup>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養一齋文集》，卷2，頁1-2。

調八股文「於科名宜，於學問無不宜」<sup>119</sup>之原因，尤其八股文所標榜駢散合一的創作風格，正適合於臺閣作手之揮灑，而此編所標榜廟堂之制的著作，以及深婉曲盡、緣情託興的文風，實即常州文人所言政事文章的最高典範，亦為後人所熟悉的常州學術與文學的標誌。此觀念脫胎於制藝文章之教，由李氏此文而更加清晰；而陽湖文派與八股文之淵源，亦由此而呼之欲出。揆其根本，通經致用，致身顯達，是常州士子的最高理想，其學術思想、文學理論無不與之相應<sup>120</sup>。

更何況李兆洛對制藝文章的期許，還蘊有更深一層的教化內涵在？面。例如在《毓文書院課藝序》中，李氏強調：

夫古今以來載籍博矣，而其統必歸之《六經》。《六經》之旨趣繁矣，而其統必歸之孔、孟。孔、孟之書，上自性命天道，大而禮、樂、刑、政，微而至于日用飲食，一舉一動，一名一物，無不賅焉。言其言，則必學其學；言其言，則必肖其神，故有一語之不衷乎道，一字之不當于節，則其為文也不至。故制藝之設，合心術、經術、治術而為教者也。<sup>121</sup>

蓋制藝之教既合心術、經術、治術為一，則其性質不止是代聖人立言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從中學習聖人之道，所謂學孔、孟之學，肖孔、孟之神者，而其目的則在由文以入道，其文則制藝之文，其道則聖人之道。由李氏之言觀之，實不宜單純的將制藝視為常州士人獵取功名的工具而已，必有其深入人心之教化在焉。如在《南村制義序》中，李氏云：

兆洛嘗讀明代制藝，如薛敬軒、王守溪、王陽明、海剛峰、唐荊川、趙儕鶴、顧涇陽、繆當時、盧建斗、黃石齋、金正希、黃陶菴諸人，其生平行誼、學業建樹、氣節，無不與文相肖，蓋言為心聲，固不可誣。而抉義理之奧窔，繹聖賢之辭氣，自有本真，與之流露，非可襲而取也。<sup>122</sup>

<sup>119</sup> 李兆洛：《舉業筌蹄序》，同前註，頁26。

<sup>120</sup> 按：有關常州學派之文論，宋翔鳳的《裴晉公論昌黎文》亦是重要篇章，可以作李氏《駢體文鈔》的註腳。其宗旨大抵仍是重駢輕散，重陸、賈而輕韓、柳。如謂「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而謂陸贄「以清切對偶之文，陳斟酌至當之理。

洞中人情，悉合經義，此翰苑一集，為不刊之書也」。其論韓、柳，既引裴度之言批評韓愈是「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又說柳宗元之文是「以之陳廟廊，不足以鋪鴻藻、信景鑠也；以之告天下，不能使婦孺動色、悍夫垂涕也」。其高下抑揚，讀者當可定奪，而常州策論與駢體合一的行文理路，於此益加鮮明。見宋翔鳳著，梁運華點校：《裴晉公論昌黎文》，《過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67-270。

<sup>121</sup> 李兆洛：《毓文書院課藝序》，《養一齋文集》，卷2，頁25。

<sup>122</sup> 李兆洛：《南村制義序》，同前註，卷3，頁13。

所謂言為心聲，文與人相肖，明代雖以八股制藝取士，然無妨於學者氣節精神之樹立。其生平行誼、學業建樹、氣節，既與文相肖，反過來說，則是從制藝當中，亦可以見其精神與氣節。筆者以為，李兆洛在此所欲強調的是，八股文此一儒學載體不但可以讓士大夫充分表達所體會的聖賢義理，更重要的是藉由八股文的學習，能培養讀書人對聖賢義理的認知，此即李氏文章即學問，或寓學問於文章之意。另外，在 許忠愍公遺稿序 中，李氏則云：

有明一代以制藝取士，而制藝即以見人品，（成）化、（弘）治之淳明，正（德）嘉（靖）之磊落，隆（慶）萬（曆）之謹嚴，無不相肖也。至天（啟）崇（禎）而雄傑魁岸之氣不可遏抑，其後致命遂志之士多出其中焉。<sup>123</sup>

在這一則論述中，李兆洛進一步將明代知識分子的品格或精神境界與制藝之教結合在一起。他認為明代之所以有如此多氣節之士，實應歸功於藉由八股文章對儒學廣泛的傳播所致。所以，制藝之教既關乎心術、經術、治術，則主講席者豈可不加重視，而讀書士子豈可以學兔園冊子的心態來為之？也因此李兆洛在入主暨陽書院之後，一方面注重八股制藝的訓練，一方面刊刻前人制舉之文以供學生參考。今觀其文集論制藝之文，約莫有數十通之多，舉其要者，如： 毓文書院課藝序、 舉業筌蹄序、 墨卷望氣序、 可堂制藝序、 南村制義序、 史自怡時文序、 吳雲瀾時文序、 澤古齋遺文後序、 小湖詩鈔序、 姑樹山房贖稿序、 駢體文鈔序、 牆東老人詩文集序、 蕉峰時文稿序、 許忠愍公遺稿序、 石齋先生時文序、 金選小題文序、 金選大題文序、 四書稽古錄序、 吳耶谿遺文序、 紅豆詩人集序、 鄉塾讀書法序、 吳士洲遺稿序、 西峰時文序、 薛畫水文鈔序、 同文一隅序 等，由此可以推知李氏對推動制藝時文教學的重視。姚永樸引其父之言曰：「當時東南講席無愧師道者，唯李君一人而已。」<sup>124</sup> 可以見李兆洛的努力在當時受到相當的肯定。

當然，李氏之戮力推動八股制藝的教學，是有其現實因素的。因為時移勢遷，考據學風潮所影響者，不止是學者治學態度的轉向而已，書院教學以及科考取士標準，亦將因此而有所轉變。首先是朝廷科舉程式的改變對學風的影響，此可由當時學者的言論觀察之。例如在 福建鄉試錄序 中，王鳴盛提到皇帝認為

<sup>123</sup> 李兆洛： 許忠愍公遺稿序 ，同前註，卷4，頁17-18。

<sup>124</sup> 姚永樸著，張仁壽校注：《舊聞隨筆》（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頁107。又按：姚瑩之言，亦可參蔣彤撰：《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道光十七年」條。

鄉會試表判之作多係夙構，非核實之道，故改定為首場《四書》義三篇、性理論一篇，二場經義四篇、五言八韻排律一首，三場仍試策五道，自乾隆己卯（1759）科為始<sup>125</sup>。在這場科考程式的變革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將考表判改為考經義，這在王鳴盛看來，是皇帝以「實學倡天下士」，欲達致「有體有用」之學的最新手段<sup>126</sup>。另外，在 金軒來豳風月令詩序 中，他感慨詞賦興盛則經術衰落，如貞觀義疏之學，終唐一代，傳習者甚寡。又慶幸當今「天子金聲玉振，以實學為海內倡，更定取士令式。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禮部試貢士，首以『循名責實』發題。蓋欲學者削煩除濫，崇雅黜浮，由記問辭章而徐進于研經窮理之地」<sup>127</sup>。而在錢大昕的相關記載中，亦有類似的感受。例如在 山東鄉試錄序 中，他提到：

夫皇上慎重科場，釐定成憲，除去表、判雷同剿襲之陋，首場試《四書》文及性理論，二場試經義，增五言排律，復諭禮臣申嚴磨勘硃墨卷之例。將使士皆通經學古，淹長者無不收錄，淺陋者不得倖售，遠近聞風，爭自奮厲。<sup>128</sup>

而對科場程式改變影響學風最詳細的描述，當屬唐仲冕（1753-1827）之言。在 芳茂山人詩錄序 中，唐氏云：

先是文體華瞻，經學剿襲居多，鉅人碩儒出，以許、鄭為宗，實事求是。海內老師宿彥，大雅博聞之士，同聲發明，翕然推獎，庠塾之講貫，孝秀之選舉，皆出乎是，天下靡然向風矣。<sup>129</sup>

科舉程式的變化，到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達到高峰，也就是將行之久遠的首場性理論移置於二場經義之後<sup>130</sup>，此舉正如漆永祥所言，明顯是為了使更多的通經之士入選進行的改革<sup>131</sup>。科舉程式的變革，同時也帶動書院教學內容的變化。早在乾隆中葉，朱筠出任安徽、福建學政，即以樸學訓士。在安徽，首先刊行《說文解字》，廣布學宮；在福建，則「以經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

<sup>125</sup> [清]王鳴盛：福建鄉試錄序，《西莊始存稿》（乾隆三十年刻本），卷25，頁6。

<sup>126</sup> 同前註，頁6-7。

<sup>127</sup> 王鳴盛：金軒來豳風月令詩序，同前註，卷26，頁9。

<sup>128</sup> [清]錢大昕：山東鄉試錄序，《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23，頁366-367。

<sup>129</sup> [清]唐仲冕：芳茂山人詩錄序，《陶山文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8冊，卷5，頁20，總頁390。

<sup>130</sup>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頁64。

<sup>131</sup>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頁61。

方」<sup>132</sup>。從這？不難看出，朱筠企圖從教育、科舉領域對以八股形式表現的理學提出挑戰，其意乃欲在這一領域以經學代理學，以考據代義理<sup>133</sup>。另外像錢大昕先後任鍾山、婁東、紫陽書院山長，所至亦特重經史實學之教導<sup>134</sup>。至於李兆洛的老師盧文弨，則更不必論矣。盧氏主講南京鍾山書院時，即大力提倡《說文》，欲以經學救俗學之失，雖然效果並不顯著，常為學政所沮<sup>135</sup>，但是他每到一處講學，都不忘宣傳他的理念。所以，漆永祥認為：「以乾、嘉考據學而論，書院為其學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成為考據學家切磋學問、培養後學的主要陣地，尤其是南方各地書院，已成為與京師《四庫全書》館并峙共盛的考據學之大本營。」<sup>136</sup>

由是而論之，臧庸在參加科舉考試時，堅持以漢學經義作答，吾人或者可以單純的認為他是受到盧文弨的影響；然而宋翔鳳在參加科舉考試時，以漢學經義作答，則似乎可以說明這種形式已逐漸形成一種時代風會<sup>137</sup>。更何況隨著考據學風潮的擴散，教學理念與朱筠、盧文弨、錢大昕同調者，實不乏其人。例如謝墉與朱珪。謝墉於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督學江蘇，他最得意的是以經解策問拔擢汪中與阮元<sup>138</sup>。朱珪則是在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的鄉試中拔擢阮元，該科朱珪用江永《鄉黨圖考說》命題<sup>139</sup>，這些現象無疑說明了漢學的影響力，正進一步擴大並且滲透到科考當中。

到了嘉慶年間，書院教學更是不再以八股文為唯一教材，其推動者即堪稱乾、嘉考據學殿軍的阮元。從《年譜》來看阮元的治學經歷，可以說是近於漢學

<sup>132</sup> [清]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見朱筠：《笥河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首，頁8。

<sup>133</sup> 暴鴻昌：《朱筠與乾嘉學術風氣》，《北方論壇》1997年第6期，頁71-72。

<sup>134</sup>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誌銘》，《春融堂集》，卷55，頁12-16。

<sup>135</sup> 詳參[清]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寄孫楚池書、答彭允初書》，《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56、260。

<sup>136</sup>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頁64。

<sup>137</sup> 按：如前所言，常州學者既依違於考據與舉業之間，表現在學術上，亦可見雜揉的特色，如丁履恆、陸繼輅等。這一點在宋翔鳳身上特別明顯。宋氏的屢試不第，或亦與不能專力舉業有關。從這個角度來看龔自珍《己亥雜詩》贈宋翔鳳所云之「玉立長身宋廣文，長洲重到忽思君。遙憐屈賈英靈地，樸學奇才張一軍」（見龔自珍著，王佩誥校：《龔自珍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下冊，頁522），就多了一層學術史的意義了。

<sup>138</sup> 詳參[清]張鑑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1，頁6。

<sup>139</sup> 同前註，頁7。

而遠於制藝。今觀阮氏在童子時，就時常被父親灌輸「讀書當為有用之學，徒習時藝，無益也」的觀念<sup>140</sup>，而在乾隆五十四年，阮元二十六歲通籍以前，他雖也曾從學於莊存與弟子，講究微言大義之學的李道南<sup>141</sup>，不過影響他最深的，當是同鄉的劉台拱、汪中、顧九苞(?-1781)、李惇(1734-1784)等治經之儒，以及他隨謝墉北上之後，所遇見的邵晉涵、王念孫、任大椿等著名學者。從這一點來看，阮元最早的著作，是漢學意味濃厚的《考工記車制圖解》，也就理所當然了<sup>142</sup>。在成進士後，阮元參與石經之校勘，除了《儀禮》十七篇之外，亦襄理《爾雅》、《毛詩》之校勘<sup>143</sup>，其後出任山東學政，則纂《山左金石志》<sup>144</sup>；視學浙江，則編《經籍纂詁》<sup>145</sup>。吾人不難看出，隱藏在這些漢學活動背後的學術價值觀，正是阮元對科舉制藝的疏離。到了嘉慶六年（辛酉，1801），阮元巡撫浙江，掌握一省最高權力，具備了推廣自己學術理念的條件與能力之後，遂將此一理念落實於學校教學當中。阮氏在杭州西湖畔，當初編輯《經籍纂詁》的原址設立詁經精舍，選兩浙諸生學古學者讀書其中，奉許慎、鄭玄木主而祀之，聘請孫星衍、王昶為山長，「月率一課，祇課經解史，策古今體詩，不用八比文，八韻詩。親擇其中詩文之尤者以為集，刻之。」<sup>146</sup>阮元不但特重詁經，排斥制藝，又打破以往書院祀程、朱、陸、王諸子的慣例，尤其以官方身分設立此一官立書院，對當時學風的轉變實具有巨大的象徵意義。孫星衍 詁經精舍題名碑記 云：

阮芸臺先生先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以前經詁之會通。及為大司農來開府，遂於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於上舍，延王少（司）寇昶及星衍為之主講，佐中丞授學於經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為命題評文之主，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尚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辯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息游之

<sup>140</sup> 同前註，頁4。

<sup>141</sup> 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李晴山喬書西二先生合傳，《學經室二集》，卷2，收入《學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2，頁396-398。

<sup>142</sup> 張鑑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卷1，頁7。

<sup>143</sup> 同前註，頁11。

<sup>144</sup> 同前註，頁13。

<sup>145</sup> 同前註，頁16。

<sup>146</sup> 同前註，卷2，頁41。

旨。簡其藝之佳者，刊為《詁經精舍文集》。既行於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才之盛，莫與為比。<sup>147</sup>

孫氏在這篇文章中所透露的，不論對科舉或是教育制度而言，都可以說是一道劃時代的訊息。他明白的指出，阮元不但在任浙江學政時，即以經古義取士；在任浙江巡撫之後，更是將其對經古學的支持觸角延伸到學校教學當中。如陸堯春所云：「晨夕講誦其中，月試以文，則多碑記論策諸體，未嘗雜以時藝，大要以窮經致用為諸生勗也。」<sup>148</sup> 尤其與前此漢學家不同的是，這些受到漢學訓練的學生，皆能憑此獵取高第，而選刻諸生佳作之《詁經精舍文集》，對科舉程式之變革而言，則誠有如程克雅所言，乃改策試為課藝，具有講習學術的價值<sup>149</sup>。此一宗旨在阮元等人的有心傳播之下，對學風扭轉影響之巨大，從孫氏此文即可窺知一二<sup>150</sup>。由是觀之，吾人當可理解為何臧庸與宋翔鳳在參加科舉考試時，會以漢儒經義作答的緣故，因為在乾、嘉之際，正是所謂的理學名臣與擁護漢學的學者官僚之間，交互主持風會的時代，也可以說是科舉取士標準動搖的時代<sup>151</sup>。

不止於此，嘉慶二十五年（庚辰，1820），阮元在廣州設立學海堂書院，雖未能完全擺脫制藝教學，但是他建立了書院講授經義訓詁之學的制度，並且帶動了

<sup>147</sup> 孫星衍：《詁經精舍題名碑記》，頁162。

<sup>148</sup> 陸堯春：《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見張嶽：《詁經精舍志初稿》，收入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冊，頁300。

<sup>149</sup> 程克雅：《從湖湘到廣東：書院課藝在晚清經學傳述中的重要性》，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湖湘學者的經學研究第一次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sup>150</sup> 按：有關詁經精舍對嘉慶以下之教育與學術的影響之詳細討論，可參黃克武：《詁經精舍與十九世紀中國教育、學術的變遷》，《食貨月刊》，復刊卷13期5、6合刊（1983年9月），頁70-79。

<sup>151</sup> 張維屏提到：「在鄉試與會試中，乾嘉時代的策論題目，開始反映出操縱儒學科舉的學術脈絡之改變，漢學趨勢及考證問題透過策論題目滲入科舉。具有考證學背景的考官們紛用考證色彩濃厚的策論試題挑選舉子，考證學的後進們漸次被發掘出來，從事考證學的青年士子因功令所趨而日漸增加。」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頁31-32。另外，胡美琦曾歸納清代書院教育的發展為三個階段，分別為東林遺風之清初書院、雍正以後為科舉準備之書院，以及嘉慶以後重經史的書院。筆者以為，書院教育的變化，與科舉程式的變革息息相關，而科舉內容的演變，又反映出一代學術的變化。嘉慶以後書院的重經史教育，不可謂與學術重心轉移無關。胡美琦：《中國教育史》（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頁495以下。



書院講學與學術主流結合的風潮<sup>152</sup>，尤其在阮元的主導下，大型考證叢書得以彙刻，考證學教育轉向體制化，使得十九世紀的漢學考證邁向嶄新的里程碑<sup>153</sup>，而這正是李兆洛所面臨的形勢。這是一種與李兆洛所秉持的學術價值觀相對立的學術形勢，在筆者看來，他的努力提倡八股制藝教學，似不離寓有與此一新興風潮對抗之意。在他看來，正學在此八股制藝代聖立言的經術文章之中，而不是飭飭的訓詁考據之業。

當然，如上所述，他重視的不只是時文的科考功能而已，更重視的是學子在研習時文時接受聖人之教的潛移默化之功，李氏所謂學問者，實在此而非在彼。此處再舉一例言之，李兆洛在《南村制義序》中云：

鄉先生南村公以名進士為名臣，所至著勳績、流惠澤，懸車而歸，矜式鄉里，典型後進，薰善氣者，景附而起。識者謂吾鄉風俗之美，實先生開之。後昆繩武，科第冠絕一時，而門內之行，迄今推家範者，以為稱首。先生不以制藝自名，而人士之歸重先生者，類皆在行誼之美，門第之盛，以時文為末節，略不言也。今年秋先生曾孫綬甲輯先生藝如干首，將付梓，而屬兆洛為校字，既卒業，乃慨然窺見先生德業之本，與其所以享崇福厚祿者，而又知方耕（存與）先生、珍藝（述祖）先生之經術湛深，其薪傳有要，源遠而流光也。<sup>154</sup>

南村公即莊存與之父莊柱。在李兆洛看來，莊氏的制藝，體現出常州風俗之美；藉由閱讀莊柱的制藝之文，可以窺見莊柱德業之本，並由此而知莊氏家族行誼之美，科第之盛，以及存與、述祖之經術湛深，薪傳有要者，正在其推為家範的門內之行，相傳不絕。所謂誠於中而形於外，制藝之教對常州士人的影響，於此可見其一斑。李氏所陳，實可謂制藝之教影響常州士人的最佳典範。

尤須注意的是，李兆洛以莊氏之學脫胎於制藝之教，此一觀點實與筆者所論不謀而合。從許多記載中，可以看到李兆洛對莊氏學術的深心讚歎，如在《珍藝先生遺書序》中，他詳細比較二莊學術之異同。形容存與之學「如泰山洪河，經緯大地，而龍虎出沒，風雲自從」。而形容述祖則是「如窮島極微，宙合未通，而奇險所關，跬步皆實，蓋有積精緻神之詣焉」。李氏並以足窺聖人之學、聖人之慮

<sup>152</sup> 張淑雅：《清末廣東四大書院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sup>153</sup> 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頁15。

<sup>154</sup> 李兆洛：《南村制義序》，頁13-14。

視存與，認為存與所言所思，乃在於探源三代經教；又以深造自得、資深逢源視述祖，並認為述祖所言所思，乃在於保存及闡發世父所言的聖人之志<sup>155</sup>。在《尚書既見序》中，李氏推崇存與的知聖人之道，猶疇人子弟之知日也<sup>156</sup>。在李氏看來，散在《六經》的堯、舜、禹、湯、文王、周公之道，如麗日之經天，得孔子、孟子之言，而聖王之心可知之矣。所以孔子、孟子乃知日的羲和、容成；而存與對聖王之道的體會理解，與孔子、孟子相近，然則李兆洛乃以存與為知日的疇人子弟明矣。另外，在《周官記序》中，李氏則云：

方耕先生仿《儀禮記》作《周官記》，甄綜經意，令就條理，欲以融通舊章，定後世率由之大凡，其於《冬官》，採周、秦諸子之言地事者輔益之，不屑屑於事為制造之末，而于官不陳藝，工不信度，府事隳壞，三嘆息焉。又攔經中大典如郊廟族屬之類，古人所論列者，件繫而折衷之，為《周官說》三卷，以輔記之所不盡。實能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後綴學之徒，鉤稽文詞，吹索細碎，沿傳訛謬之說，一切可以盡廢。有志于治者，由其說通其變，舉而措之，如視諸掌，非徒經生講解之資而已也。治經者知讀書所以致用，必有觀其會通而不泥于牽者。庶幾《六經》之在天壤，不為佔畢記誦之所荒，不為迂僻膠固之所竄也夫。<sup>157</sup>

李兆洛蓋以存與《周官記》不屑屑於事為制造之末，非徒經生講解之資，乃欲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者，實與樸學塗轍不能相接。在存與、兆洛這等文士看來，讀書所以致用，然致用必觀其會通，庶幾使《六經》之在天壤，不為佔畢記誦之所荒，不為迂僻膠固之所竄。則「佔畢記誦」、「迂僻膠固」乃是對經生訓詁之業的批評明矣。

李氏既推服莊氏之學，故其學術見解亦頗受莊氏之影響。例如對鄭玄的批判。必須先指出的是，批判鄭玄是莊氏家族經說的一大特色，蓋莊存與以為後世無由見到三代聖王的博大氣象，實導因於鄭玄以訓詁替代文章經術所致<sup>158</sup>。而李兆洛在其著作中，亦不止一次的批判鄭玄。如在《兩漢五經博士考序》中，李氏云：

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蠹也。

<sup>155</sup> 李兆洛：《珍藝先生遺書序》，同前註，頁18-19。

<sup>156</sup> 李兆洛：《尚書既見序》，同前註，頁6。

<sup>157</sup> 李兆洛：《周官記序》，同前註，頁8。

<sup>158</sup> 按：有關莊氏家族對鄭玄之批判，請參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第4、5章。

西漢經師，大抵各為一說，不能相通，就其不相通而各適於道焉，此正聖人微言大義，殊途同歸之所存也。康成兼治眾家，而必求通之，于是望文穿鑿，惟憑私臆，以為兩全，徒成兩敗，此正徐防所謂輕侮道術者也。<sup>159</sup>

至其十三經斷句序則云：「康成以下，經師競出新致，幾於望文生義。各以意屬而持之成理，或末師賢於往故，此又多師之藉也。」<sup>160</sup>在《暨陽答問》中回答蔣彤所提問時，他再次強調：「師道之壞，實始於鄭康成。秦、漢諸儒，各執一經，傳之其徒而不相陵躐，至康成併合諸家，羅為己有，於是士不專經，人無常師，門戶除而傳授失，師道因以大壞。」<sup>161</sup>所以陳澧乃云：「本朝儒者醜詆鄭君者，劉逢祿也，李兆洛也。」<sup>162</sup>另外，從《暨陽答問》中，吾人尚可以見到李氏論學受到莊氏家學影響的痕跡。《暨陽答問》乃李氏晚年與學生的問答之語，從中可以窺知李氏學術的最後歸向。其中李氏時有批評左氏不祖孔子之語<sup>163</sup>，又以為有經則可以無史<sup>164</sup>，乃至特重《周官》<sup>165</sup>，此等說法，無疑皆具莊氏家學身影。至於直接對莊氏學術表示讚譽的，也有四條。如云：「二莊皆善讀書，能自出主見，卓然成一家之學。」<sup>166</sup>又云：「方耕先生《周官記》，其旨大概為後世設法，是以不沾沾考據，較《周官祿田考》、《周禮軍賦說》立意皆深。」<sup>167</sup>《周官祿田考》、《周禮軍賦說》皆漢學考據之作，而兆洛以為不逮存與《周官記》，其學術傾向，在對二者的高下揄揚之間，已表露無遺。李氏又云：「莊珍藝先生《明堂陰陽經夏小正經傳考釋》即小見大，（夏）小正不過數百字，治天下大道理悉包其中，真是會讀書。」<sup>168</sup>又云：「珍藝先生以今文通小正古文，其文義始周備。《管子》法制甚闊實，苦文義多難通，須亦以此法求之，又須有《周官》規模在胸中。」<sup>169</sup>筆者觀李氏所論，乃從闊大處見莊氏學術，與其重《通

<sup>159</sup> 李兆洛：兩漢五經博士考序，《養一齋文集》，卷3，頁18。

<sup>160</sup> 李兆洛：十三經斷句序，同前註，卷4，頁22。

<sup>161</sup> 蔣彤：《暨陽答問》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子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88冊，卷1，頁1。

<sup>162</sup> 陳澧：《東塾雜俎》，卷11，頁26。

<sup>163</sup> 蔣彤：《暨陽答問》，卷1，頁2、頁6。

<sup>164</sup> 同前註，卷2，頁3。

<sup>165</sup> 按：在《暨陽答問》中，李兆洛總計提到九次《周官》或《周禮》，皆為讚揚。

<sup>166</sup> 蔣彤：《暨陽答問》，卷4，頁1。

<sup>167</sup> 同前註。

<sup>168</sup> 同前註。

<sup>169</sup> 同前註。

鑑》、《通考》，正是同一思維。蓋李兆洛既如此深心服膺莊氏之學，也因此莊氏家族沒落之後，整理刊刻莊氏遺著，以及發揮莊氏家族之學的任務，也就落到李兆洛的身上了<sup>170</sup>。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一般的看法？，常州學派的傳授譜系，是莊存與將其《公羊》學傳授劉逢祿，劉逢祿再將其《公羊學》傳與龔自珍與魏源，又因為龔、魏二人之說在晚清學界的巨大影響，使得常州《公羊》今文之學成為清末學術界的顯學，其影響之鉅大與全面，至今仍難有定論。但是，就筆者對常州學派的理解而言，常州學派的傳授譜系並非如上述所列如此簡單而已，應當是常州文人集團對包括由莊氏、張氏所揭櫫的學術宗旨，在有意無意之間的擴散所造成<sup>171</sup>。劉逢祿當然是使常州學術為世所知的重要角色，但筆者以為莊綬甲、宋翔鳳、李兆洛以及眾多與莊氏、張氏學術淵源相同、學術理念一致的常州文士，對此一學術理念的接受與宣揚，才是常州學派能在晚清具有震撼搖盪之力的主要原因。尤其不論是莊氏家族所揭櫫的微言大義之說，或者是張惠言所標舉的意內言外之旨，本就適合用於發揮在詩賦文章之上，這不但可以解釋為何晚清《公羊》學或常州詞派的奉行者多為文人，如王闈運(1833-1916)、龔橙(1817-1878)、譚獻(1832-1901)、莊棫(?-1878)等人的原因；也可以解釋為何章太炎、劉師培會批評常州學者之治學是文人說經的原因。

<sup>170</sup> 關於李氏整理刊刻莊氏遺著，以及發揮莊氏家族之學的詳細內容，請參拙著：《常州學者莊綬甲》，二〇〇二年七月四—五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常州學者的經學研究第一次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丁亞傑：《李兆洛與常州學風（同上）》承載：《李兆洛與常州今文學》（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五—六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常州學者的經學研究第二次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sup>171</sup> 按：正如梁啟超先生所指出的，嘉、道時期「最要注意的是新興之常州學派。常州學派有兩個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漸合為一。他們的經學是《公羊》家說——用特別的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莊方耕存與、劉申受逢祿開派；他們的文學是陽湖派古文——從桐城派轉手而加以解放。由張舉聞惠言、李申耆兆洛開派。兩派合一起來產出一種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考證學的基礎之上建設順、康間『經世致用』之學。」（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28）這一點，李兆洛已有先見之明。蔣彤《清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條下記：「（李兆洛）赴龍城書院，院西為先賢祠，祀季子而下六十有八人，先生率弟子輩瞻拜，惻然曰：『前人創此基業，後人豈忍廢之？亟宜與守令議，且補入莊宗伯、張舉文二人。』」（頁190）蓋欲觀常州學派之學術精神及其對晚清學術與文學之影響，勢須合觀二者，方能得之。

## 五、結論

陸繼輅的《合肥學舍札記》有「稚存先生詩」一條，其下云：「乾隆庚戌（五十五年，1790），稚存先生計偕入都，有詩見懷云：『同居冷巷聽嚴更，細草春來欲上城。絕憶綠暉橋畔路，兩株松下一書生。』『奇才樸學我兼師，辛苦高齋論述時。他日許教兒輩拜，臧生經術陸郎詩。』臧生者，在東鑪也。」<sup>172</sup>洪亮吉所謂的「奇才樸學我兼師」，在筆者的理解看來，仍是希望詩賦文章與經學訓詁皆能兼得之意，所以他要兒輩學習陸繼輅的詩賦文章，也要學習臧庸的經術漢學。乾、嘉之際，確實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學術系統，於此再一次得到印證。只不過，洪亮吉眼中的經術，其內涵已從所謂的八股制藝代聖立言之經術文章，一轉而為樸學訓詁之業矣。

當然，一般的看法，往往將觀察清代常州經學的目光放在《公羊》學方面。其實，像莊氏家族的《詩》、《書》之學，洪亮吉的《左傳》學，孫星衍的《尚書》學，張惠言的《易》、《禮》之學以及臧庸的漢學與群經研究等等，都是常州經學組成的重要元素。只是吾人在推崇其學術成就時，也當放大觀察的視野，以求得其學術之內涵與背景。如此，當我們在討論常州學派時，才不會陷入明知孫、洪、臧之學既與脫胎於文章之路，堅持儒家經典所蘊涵義理之普世價值的莊氏家族學術屬性不合，又無法漠視其存在而不加討論的這一尷尬場面。

其實，伴隨著考據學方法及因之而形成的學術價值觀之擴散，漢學研究的風氣，除了廣被於吳、皖、嘉定、揚州、高郵、錢塘等地之外，常州學者也在有意無意之間接納了這股學術風潮。然而或因常州自有濃厚的學術傳統，與考據學在方法及價值觀上有所牴牾，所以從乾隆中葉洪亮吉、孫星衍、莊述祖等人援考據學方法治學以來，其所呈現之學術內容即與吳、皖有相當大的差異；乾、嘉之際的臧庸與李兆洛，更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前者擁抱漢學，畢生以考據輯佚為職志；後者則堅持常州原有的學術傳統與批判漢學考據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除了審視二莊、孫、洪、張、劉等人對考據學的態度之外，本文更藉由觀察臧庸與李兆洛這兩位同學於盧文弨門下，而又與莊氏家族關係密切的常州著名學

<sup>172</sup> 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57冊，卷1，頁6，總頁296。

者之學術歷程、論學態度、學術價值觀以及與當時學術界的互動情形，探討乾、嘉之際常州一郡在考據學潮流影響之下所形成之特殊學風及其意義。筆者以為，常州學者面對考據學的複雜態度，有其珍貴的學術與文化史的意義。簡言之，常州學派的產生，乃是根源於常州特殊的學術精神——將科舉儒學所蘊育的經世情懷，投入學術研究的領域之中。而引發其高揭經世情懷的導火線，其實是伴隨著考據學風潮所興起的新的學術價值觀之挑戰。

如果再深一層來看，為何會有如此多的常州學者會堅持自己所學，而鄙視新興的漢學考據？此當與他們心目中的學術標準有關，而此一學術標準又是其學術傳統的體現。在他們看來，同樣是漢學，西漢通經致用的學術宗旨要高於東漢的小學訓詁。在筆者看來，常州學者普遍存在著具有教化意義的「經典意識」以及通經致用的「西漢情結」。這一點，只要從本文所引莊培因、丁履恆、李兆洛、宋翔鳳等人的言論中即可窺出端倪。在常州學者的意識中，此一「經典意識」與「西漢情結」又包含了三種層次。其一，為角色扮演。常州學者普遍希望自己能成為當代的董、賈，以策論發揮經義，藉此博取功名，傾向從政治領域而不是從學術領域來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其二，為表現形式。即希望藉由策論文章的形式表達其學術見解，而不屑於訓詁考據。在他們看來，訓詁考據為膚為末，方法既破碎，也無由藉此而知聖王大道，乃是列在「儒林傳」的經生之所為，非通儒當有之志。其三，則為其學術內涵以義理為主。不論是對西漢此一理想的論學境界之強調，或者是對策論文章的堅持，都可以體現此一原則。在他們看來，能與《五經》（尤其是《尚書》）所闡發的聖王之道相發明的，莫過於《四書》（尤其是《孟子》）；而發揮經義最理想的方式，莫過於西漢大儒所流傳下來的策論形式。以此之故，當常州學者治經強調西漢，發揮聖王微言大義的同時，我們可以輕易發現他們輔以為論說依據的，往往是宋儒見解，原因無他，以策論之形式易於經書義理相附會之故也。這一點，特別容易從莊存與、莊述祖及劉逢祿討論《尚書》的著作中觀察到<sup>173</sup>，學者若能充分認識《尚書》之學在莊氏家族學術中的地位與

<sup>173</sup> 按：關於莊氏《尚書》學援引宋儒之說的討論，請參胡玉縉：《許頤經籍題跋經部之一·尚書既見書後》，收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4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頁27；江翰：《尚書既見提要、尚書今古文集解提要、書序述聞提要》，收入柯紹忞等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31、241。

作用，當不難理解莊氏學術此一論學重宋儒的意義<sup>174</sup>。

---

<sup>174</sup> 按：有關《尚書》之學在莊氏家族學術中的地位與作用，請參拙著：《常州莊氏學術新論》，第4章、第5章。

# 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 態度及其意義

## ——以臧庸與李兆洛為討論中心

蔡長林

伴隨著考據學方法及因之而形成的學術價值觀之擴散，漢學研究的風氣，除了廣被於吳、皖、嘉定、揚州、高郵、錢塘等地之外，常州學者也在有意無意之間接納了這股學術風潮。然而或因常州自有濃厚的學術傳統，與考據學風在方法及價值觀上有所牴牾，所以從乾隆中葉洪亮吉、孫星衍、莊述祖、張惠言等人援考據學方法治學以來，其所呈現之學術內涵即與吳、皖、揚州等學者純粹之漢學考據有相當大的差異；乾、嘉之際的臧庸與李兆洛，更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類型。前者擁抱漢學，畢生以考據輯佚為職志；後者則堅持常州原有的學術傳統與批判漢學考據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本文擬藉由觀察上述所列常州著名學者之學術著作、學術歷程、論學態度、學術價值觀以及與當時學術界的互動情形，探討乾、嘉之際常州一郡在考據學潮流影響之下所形成之特殊學風及其意義，並進一步說明常州學派之產生，乃根源於常州特殊的學術精神——將科舉儒學所蘊育的經世情懷，投入學術研究的領域之中。



## The Mid-Qing Changzhou Scholars' Views on Evidential Scholarship: Focusing on Zang Yong and Li Zhaoluo

TSAI Ch'ang-lin

The widely established evidential method and its resultant academic values heralded a new spirit in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regions of Wu, Wan, Jiading, Gaoyou, Qiantang, and beyond. Although scholars in Changzhou were also affected by this new kind of scholarship, the region had its own rich tradition in classical study, which differed from evidential method and its values. As a resul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Qianlong reign, even though Hong Liangji, Sun Xingyan, Zhuang Shuzu, Zhang Huiyan and others had used evidential methodology in their studies, the shape of Changzhou scholarship was still observably different from the strict evidential methodology of Wu, Wan, or Yangzhou.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 Zang Yong and Li Zhaoluo represented two entirely different styles of classical study. Zang persisted in so-called Han learning; evidential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 work were his life-long commitment. In contrast, Li Zhaoluo underscored Changzhou's scholarly tradition and harbored a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evidential study.

In this ligh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se famous Changzhou scholars' scholarly writings, their scholarly careers, as well as their academic attitudes and values. It also investigat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angzhou scholars and the larger scholarly world of the time. It illustrates the unique style of Changzhou scholarship under the impact of evidential study, illuminating the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of the Changzhou school. It suggest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ngzhou school was rooted in Changzhou's own long-standing scholarly tradition, whereby emphasis was put on the practical concerns of Confucianism, particularly the kind of Confucianism tha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amination/bureaucratic system, which informed a significant part of Changzhou scholars' classical studies.

**Keywords:** Changzhou scholarship    Han learning    evidential studies  
eight-legged essay